



常州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社科优秀期刊

常州社会科学

CHANG ZHOU SOCIAL SCIENCES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三强”“三更”

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纵论民国初期的武进市

2015 **2** 

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常州市社会科学院

市第十三届社科优秀成果表彰 暨市社科联五届四次理事（扩大）会议



3月16日，市第十三届社科优秀成果表彰暨市社科联五届四次理事（扩大）会议在市行政中心召开。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徐纛、副市长方国强出席会议。各辖市区委宣传部分管领导，各学会、社科团体代表，在常各高校科研处处长、市社科联五届理事会全体理事等共计15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对常州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代表进行了表彰。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共评出204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16项，二等奖41项，三等奖147项。在江苏省第十三届社科优秀成果评奖中，我市荣获二等奖1项，三等奖8项，位列全省前列，充分彰显了我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徐纛要求全市社科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担当、强烈的进取之心，奋力推动全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实现新的更大发展。要强化政治意识，在高举旗帜上更加坚定；要强化问题意识，在服务发展上更加主动；强化合作意识，在组织协调上更加有力。



新常态下看中坚

叶英姿

新常态是当下的热词。最早从经济、环境起，很快就被广泛引用到政治、文化、社会、党建领域，延伸至各行各业、各种各样，涵盖起方方面面的新状态、新业态、新动态、新生态来，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多样、时代特色鲜明的新概念。

中坚是那些从正面起决定作用的核心力量的统称。大至国家、民族、社会，小至区域、单位、团队，中坚是决定性质和方向的“擎天柱”，是掌控和影响全局的“定海神针”。这是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定律。现在的具体问题是，新常态下，中坚何在？中坚应当如何适应和把握新常态，发挥自身的作用和威力？

中坚的内涵定义是众人公认，外延界定却比较驳杂。有说是领导、上层、精英的，是党员干部的，也有说是广大人民群众；有说是知识阶层的，是中产阶层的，也有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是工农的。持论有差异，缘于出发点、侧重点、衡量点不同。

中坚是一种定位。其要义突出两点，一是正面，二是核心。无论在什么区位、层次，能起这两个作用的，就是中坚之一。中坚不能简化、弱化为“中间”，与高下、大小和头尾等无绝对联系，而应当是一个各当其任、互相支撑、群策群力的集成。是领导、党员干部，就应当昂首挺胸，堂堂正正做率先；是知识分子，就应当思考反省，清醒睿智做良心；是人民群众，就应当立足岗位，生产创造做脊梁。

中坚是一种定力。历史总在建立破除的循环中曲折前进，在肯定否定的反复中螺旋上升。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矛盾、考验、挑战和磨难，以前的基础、储备可能无能为力，原有的学识、能力也许捉襟见肘，容易使人陷入迷惑和恐慌。可以颠覆旧传统，摸索新规律，但不能自乱心智；可以怀疑老经验，尝试新创新，但不能自乱阵脚。中坚是保持方向和前进速度的关键。

中坚是一种定心。中国共产党用自身从弱到强、从知识阶层到执政党的奇迹，说明了一个真理：没有天生的革命者，都是从现实中觉悟，确立信仰和目标的；没有天生的革命家，都是在战斗和实践中成长，在得失荣辱里成熟的。中坚的责任和意义，在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无私无畏、不屈不挠，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目录

CONTENTS

二〇一五年第二期·总第165期



P17



P41



P43

本刊特稿

04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三强”“三更” / 徐 缨

重点课题

06 单独两孩：政策落地需未雨绸缪 / 课题组

09 市区公共停车场汽车停放管理与收费问题的建议与对策

/ 课题组

聚焦率先

12 加快推动金坛工业园区发展新跨越的思考 / 虞 乐

15 常州实施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探索及思考 / 田 泽

19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发展策略研究 / 张步东

23 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 课题组

经济分析

27 常州市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与比较分析 / 蔡文静 干晓玉

30 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经济运行浅析

/ 李建新 刘光俊 肖新民

32 “走出去”企业国际化重构的税收风险及应对 / 俞 晟

工作研究

34 致力机关道德教育的调查与思考

/ 李沛然

37 构筑新时期卫生计生人才优势的思考 / 王 莉

39 社情民意调查工作的思考 / 余 峰

41 人民调解发展过程中亟需回答的四个问题
/ 高玉华 上官正国 许海军

常州文化

43 纵论民国初期的武进市 / 宗清元

高层之声

这两年，习近平带火的 9 个热词

八面来风

朱元璋狠揍茹太素 / 中国需要新一轮文化觉醒 / 构建大国心态是
中国的一场硬仗 / 制造强国的历史抉择 / 中外引才思路差异有多
大 / 没有一朵花在自闭中灿烂 / 其实，我们皆需觉醒

信息交流

社科联举办“人文养心”学术沙龙

“社科专家面对面”第二讲讲刘国钧的故事

走访企业共叙发展话题

主 编： 陈满林

执行主编： 罗志平

副主编： 叶英姿

张步东

执行编辑： 朱玉川

编 辑： 耿丽珍

苏 刚

李 军

陈建萍

许 健

陈雅娟

发 行： 徐 栋

刊号： 苏新出准印 JS-D038

地址： 常州市行政中心 1 号
楼 A 座 1423 室

电话： (0519) 85683854

邮编： 213022

网址： www.czskl.org

邮箱： czshkx@126.com

印刷： 金坛教学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5 年 04 月 25 日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三强”“三更”

徐 纓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当前,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实践,鲜活生动的群众历史创造,广泛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既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了新的更大机遇。全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以高度的责任担当、强烈的进取之心,奋力推动全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一、强化政治意识,在 高举旗帜上更加坚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

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向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第一要务。

一是牢记使命,当好“旗手”。当前,在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的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各种制度模式的学术争论和各种思潮、价值观念的交流交锋异常激烈。哲学社会科学界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力量。我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增强定力,站稳脚跟,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到头脑清醒,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要切实加强对社科学会、研究机构以及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讲坛的管理,

不断巩固意识形态工作的良好态势。

二是履行职责,当好“号手”。社科理论界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主力军,必须切实肩负起自己的职责和使命。要继续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回应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用全面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分析问题,既讲“怎么看”,又讲“怎么办”,多出具有说服力、解释力、影响力的社科理论成果,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三是发挥优势,当好“推手”。

社科工作服务党和政府工作大局，当前就是要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加强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战略部署，涵盖了新形势下全局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加强对“四个全面”等重大问题的学习宣传、研究阐释是当前社科理论工作的重中之重。具体到我省我市，就是要紧紧围绕“强、富、美、高”，围绕“迈上五个新台阶”，围绕“重大项目深化”，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常州城市发展等主题进行具体化研究、大众化阐释，不断营造氛围、凝聚共识，推动党和政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二、强化问题意识，在服务发展上更加主动

理论源于实践、服务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正确回答好时代提出的问题，科学回应好实践提出的课题，才能更好地展现自身价值和力量，才能赢得更大发展空间。

一是在破解现实难题上见成效。对热点难点问题的解答的深度和广度，检验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当前，一些社科理论领域还存在远离现实生活、脱离实际、自娱自乐的现象。这不仅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功能价值的发挥，也削弱了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切入时代、立足现实，把个人的学术追求融入到火热的社会实践中。下功夫研究事关全市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下功夫研究广大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下功夫研究深层次的思想理论问题，把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结合起来，为市委市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为常州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二是在促进成果转化上求突破。理论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应用。全市社科工作者要进一步强化成果转化意识，加强基层工作调研，多说管用的话，多提可操作的建议，避免坐而论道，避免华而不实。要不断增强社科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成果转化打下基础。成果出来后，要通过各种途径搭建成果转化交流平台，向社会、政府、企业等大力进行推介，使社科成果的效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应用。推进应用研究与理论外宣相结合，对我市发展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性总结，通过高端学术交流、高端媒体发布，实现对常州城市的高端外宣。

三是在加快智库建设上创特色。要把握党中央加快新型智库建设的机遇，根据我市的实际状况，研究制定社科院发展规划。按照“小而精”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围绕某一项或几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持续性地研究，争取在某一个方面形成自己的理论优势，打造全市的理论高地。要高度重视智库人才建设，实施好领军型人才培养计划，为智库建设提供雄厚的人才支撑。

三、强化合作意识，在组织协调上更加有力

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整合资源，集聚优势，形成合力，以小博大，是当前新形势下做好社科工作的关键。

一是注重“联合”。社科联是个大家庭，各类人才众多，各种思想汇聚，社科联要在“联”

字上做文章，在“合”字上下功夫，努力把各方面的力量聚合起来，把各方面的潜力挖掘出来，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认真履行好组织联络、指导协调、管理服务职能，更好地引导、凝聚、教育、服务全市社科工作者。要夯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进一步加大工作作风建设，提高工作效率，把社科联建成“家风正”、“家味浓”的社科工作者之家。

二是注重“整合”。积极创新科研组织模式，加强社科理论界与实际工作部门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有效沟通合作，探索重大课题由相关职能部门、社科联以及专家学者组成攻关团队进行研究的新机制。大力探索校际之间、团队之间、专家之间的协作攻关和协同创新途径，加强与省社科院、上海社科院等地名师大家的沟通与联系，通过柔性引才的方式，使之能够为我所用。通过一系列的整合探索，破除社科研究领域“单兵作战”和“孤岛”现象，改变理论研究的低水平重复、低档次徘徊的局面，提高研究成果的“含金量”。

三是注重“融合”。当前，推动跨学科融合发展对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综合实力，特别是对于解决系统复杂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要以“问题”为导向，加快跨学科研究组织、研究基地的建设和发展，组建跨学科的攻关团队和项目平台，形成协同合力，打破学科和部门之间的壁垒，推动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发展，推动社科研究水平和整体实力的提升。

作者单位：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罗志平)

单独两孩：政策落地需未雨绸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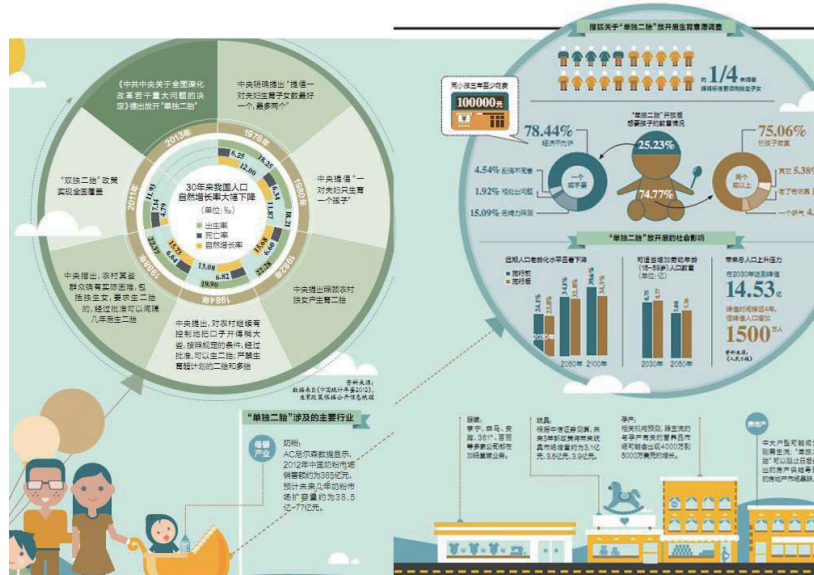
课题组

单独两孩新政是应对目前我国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人口发展形势而采取的一项政策调整措施。这一生育政策的调整，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并对计划生育治理体系的建设以及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极大的挑战。

一、常州市“单独两孩”生育意愿的调查与分析

1. 单独两孩新政目标人群有着较高的生育意愿。两孩结构是大多数家庭的理想模式。从入户调查的目标人群来看，“想生第二孩”的占比为 45.98%，“不想生第二孩”的占比为 36.42%，目前仍不确定的占比为 17.59%。其中新北区、溧阳市目标人群的生育意愿较高，主城区、武进区目标人群的生育意愿相对较高。

2. 经济条件、生育政策是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超过一半的目标人群认为独生子女太孤单、国家政策的鼓励是形成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而在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中，有 68.71% 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条件会影响到二孩的生育意愿，有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生育政策是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首要因



素。

3. 二孩性别的偏好较为淡化。超过一半的家庭对二孩的性别并没有特别的倾向。第一孩的性别对家庭二孩性别的偏好存在着一定的影响，部分家庭更希望第二孩的性别区别于第一孩的性别。

4. 二孩生育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未来三年。在有二孩生育意愿的目标人群中，规划生育时间集中在未来三年（2015-2017）的占到近 70%，其中“现孕”的比重接近四成，目前仍未确定生育时间的有 30.78%。其中，妇女年龄直接影响着二孩生育的时间规划，妇女年龄在 31~35 岁、36~40 岁两个年龄层次的更倾向于“现孕”，比重均在 40% 以上，年龄越小，现孕的比重越低，还未确定生育

时间的比重越高；第一孩年龄对二孩生育的时间有着较大的影响，规划在未来三年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比重与第一孩的年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一孩年龄越大的，规划在未来三年生育二孩的比重越高。

二、“单独两孩”新政实施对常州人口发展与治理的影响

1. 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1) 新增出生人口短期内会显著增加。单独两孩新政实施后，由于目标人群生育意愿的累积效应集中释放，常州新增出生人口在短期内（2015-2018 年）将会会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增长。根据对目

标人群的测算以及目标人群生育意愿的问卷调查结果，考虑到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的差异，单独两孩新政实施带来的新增出生人口数将在未来几年内维持在2000人左右。可以预计，待消化完现有目标人群生育意愿后，由“单独两孩”新政带来的新增出生人口将会稳定在一个正常的较低水平上。

(2) 出生缺陷发生的风险增大。相关研究表明，高龄是高危妊娠重要因素之一，会给母婴造成一定的危害。生育意愿调查中，有生育愿望的妇女年龄在31~35岁、36~40岁两个年龄层次的“现孕”比重均在40%以上。“单独两孩”新政实施将引起短期内高龄孕产妇人数的增多，必然会增大出生缺陷发生的风险，对我市出生人口素质带来一定影响。

(3) 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单独两孩”新政的实施，打破了原有对第一孩为女孩的农村户口实施照顾生育的城乡二元政策格局，使更多的夫妇可以不必考虑第一孩的性别生育二孩，对平抑二孩性别偏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

2. 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

(1) 对医疗资源产生较大压力。随着单独两孩新政的实施，新增出生人口将在短期内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个增长不仅仅体现为单独两孩新政实施直接导致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数量的增长，而且单独两孩新政实施对以往政策中符合二孩生育的家庭还会形成示范诱发效应导致二孩生育数量的增长，这就会使得现有的基本满足需求的公共医疗资源

会在短期内形成较为紧张的局面，特别是从事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分娩生育以及婴童医疗保健的专业医疗资源会在短期内形成较大的压力。

(2) 加剧教育资源短缺的紧张局面。目前我市学校布局仍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中心城区学校资源过于集中，生均占地面积等各项指标明显偏低，学前教育资源的保障水平仍相对较低，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需求。随着单独两孩新政的实施，新增出生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必将会导致现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紧张局面在未来的三五年中进一步加剧，上学难、上好学难的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凸显。

3. 对医疗保障政策落实的影响

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新增出生人口将对生育基金、新生儿基本医疗保险等公共医疗保障政策产生直接影响。一方面，预计今后几年受单独两孩新政影响，全年生育基金将多支出2660万元左右；另一方面，随着生育基金享受对象人数的增加和统筹金收取比例的下降，目前存在的生育保险基金结余情况不容乐观，再加上对新生儿基本医疗保险的补贴随着新政的实施会有所增加，势必会对地方财政也带来一定压力。

4. 对相关产业的影响

“单独两孩”新政实施带来的出生人口增加在一定时期内会带动婴儿生育、婴童抚养、早期教育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调查显示，二孩生育家庭更注重第二孩的优生优育，关注母子健康，这在极大程度上会推动常州家政类

服务业、婴幼儿用品及消费产业、婴幼儿早期教育培训市场的快速发展；而在从传统的三口之家向四口之家的发展过程中，出于对居住条件的改善，可能会对较大户型的住房产生一定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大户型房产市场的活跃程度。

三、应对单独两孩新政实施的对策建议

1. 创新体制机制，大力推进人口治理的现代化。积极形成人口治理的协同合作机制，建立人口管理职能部门与工商、城管、规划、国土房产、建设等职能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将计划生育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适合我市市情需要的长效人口管理机制；加强人口治理的信息化，构建人口动态监测网络。合理编制人口发展规划，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单独两孩新政条件下的生育累积能量逐步释放，避免人口增长的大起大落，确保出生人口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诚信计生建设，将计生信息纳入社会征信系统，完善诚信计生利益导向政策；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和工作办法，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2. 创新方式方法，积极推进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一是要强化服务理念，实施寓宣传于服务的生育文化工程。积极营造有利于生育文化建设的舆论环境，进一步拓宽宣传教育对象的范围，针对符合单独两孩新政条件的高龄孕产妇家庭，提供私密化、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在服务中渗透宣传；进一步强化计生服务机构的宣传功能，充分发挥各级计划生

育宣传技术服务机构作为传播生育文化、婚育文明主力阵地的作用；二是加强制度建设，消除影响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现实因素。进一步完善优生优育、生殖健康服务制度，坚持广覆盖、有重点的优生优育和健康宣传教育，全面实施免费婚孕前医学检查和免费“三项优生监测”；建立健全包含奖励、优惠、扶助、救助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制度，在完善计划生育家庭关怀工作的基础上加快群众新型婚育观的形成；大力推进“关爱女孩行动”，积极倡导男女平等、关爱女孩和少生优生等社会新风尚，推动婚育观念的转变、性别比等问题的综合治理和计划生育的深入发展；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制度，形成经常性服务管理与集中专项治理活动相结合的工作制度；三是要开展群众活动，引导群众成为生育文化建设的主人。充分利用单独两孩新政实施的契机，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生育文化特色活动，把生育文化建设融入到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广场文化、旅游文化中去，创建地方性的生育文化品牌，引导和发挥广大群众传播新型生育文化、推进生育文化建设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

3. 构建群工网络，围绕创建幸福家庭做好计生服务。一是要创新体制机制，完善计生服务的群众工作网络，加大群众工作统筹力度，促进服务群众资源下沉，积极打造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建设市、区（县级市）、乡（镇、社区）、村（居）四级群众工作网络，形成推进群众工作的合力；二是要围绕服务家庭健康、促进家庭致富、完善家庭保障，开展创建幸福家庭的人口计生服务活



动。对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开展养老服务、医疗保障、综合保险、教育资助等多方位的扶持救助，帮助计生家庭创业致富，通过提供技能培训、协助申请小额贷款等方式促进家庭增收、致富，以现行计划生育奖扶特扶政策为基础，梳理整合相关政策措施，建立完善优先保障计生家庭发展的福利体系。

4. 关注人口素质的提升，全程做好妇幼保健工作。一是要加强保障与落实，提高妇幼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执行能力，要从组织管理、资金保障、项目执行等多方面入手，创新工作方法，提高服务质量，切实推进落实重大妇幼卫生服务项目，提高妇幼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执行水；二是要加强孕前优生筛查服务，扎实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广泛宣传孕前优生筛查的必要性，增强计划生育家庭免费孕前健康检查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充分利用基层计生工作网络，积极做好组织动员工作，切实保证目标人群孕前健康检查的覆盖率，对高龄生育家庭进行风险评估，给予一对一的健康指导，增强高风险人

群的防范意识和能力，降低或消除导致出生缺陷的风险因素；三是要加强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监管，进一步规范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的监管行为，增强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的监管能力，促进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逐步提高，更好地满足妇女儿童需求，提高群众满意度。

5. 合理规划和配置社会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一是要加强医疗卫生机构产科儿科规划建设，优化卫生资源布局，增加科产和儿科的床位设置，提升基层机构儿科服务能力；完善孕产妇和新生儿急救绿色通道，在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分别建立全市孕产妇和新生儿急救中心，在金坛、溧阳、武进分别建立孕产妇和新生儿急救分中心，承担急重症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工作；加强妇幼保健信息监测管理，加快推进全市妇幼信息系统建设，实现妇幼信息的全覆盖，加强妇幼卫生信息的动态监测。二是要进一步加大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在现行规划基础上，做好新增人口对幼儿园、小学等需求的测算，

（下转第 18 页）

市区公共停车场汽车停放管理与收费问题的建议与对策

课题组



一、常州市区公共停车场汽车停放收费管理建议

1. 科学规划建设，合理配置停车资源

树立大交通观，从优化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与建设管理的角度考虑停车资源的配置问题。公共停车场规划要结合城市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等上位规划，并与公交规划等相关专项规划相协调，与动态交通及城市交通管治方案相协调，从全局出发，考虑停车需求管理，不单纯以满足停车需求为目标。公共停车场布局尽量结合停车需求大的地区、人流集散量大的公共建筑等，大型商业中心、CBD 地区应重点规划。坚持“用者自付”的市场化原则，逐步减少免费道路停车位。结合常州轨道交通建设探索设立 P+R 停车场（Park+Ride，机动车停车后换乘公交系统），为停车换乘公交系统的私家车主们提供停车位，鼓励市民绿色出行。

2. 建立专门的公共停车场管理机构

改变现有停车管理模式，优化现有停车管理机构设置，设立专门的停车管理机构，变多头分段式管理为单一机构全程式管理，变自督自管为第三方管理，多方协助，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停车管

理多头、分段以及责权不等与不清等问题。

交通管理部门历来是城市交通的管理者，由于其掌握详实的交通状况资料和道路状况资料，能从整个城市交通系统来协调组织管理，并有执法权。因此建议确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公共停车场的管理权力，建立专门的公共停车场管理机构，并有一定的约束机制，监督公共停车场的正常使用，防止公共停车场的所属单位将停车场挪作它用。

停车场管理机构应经常对辖区内的公共停车场运转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保证公共停车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对于公共停车场设施的残缺，应督促停车场所属单位及时维修。对于一些不符合要求的公共停车场，应设专人参与停车场的规划管理，使之满足停车需求。

3. 修订完善现有停车场建设与管理文件，制订差别化停车收费新政

建议将常州市停车收费调控区域划分为一类、二类、三类三个层级，其中一类区为调控区，该区域内鼓励公交出行，减少停车供给，降低动态交通压力，建议将常州老城区、武进老城区与新北商业中心区确定为一类区，对该类区域实行较高的收费标准；

二类区为供需平衡区，该区域鼓励公交出行，同时满足近期小汽车停放需求，该类区域以现行收费标准为主要定价依据；三类区为一般区。

按 2007 年出台的常州市停车收费政策，我市中心区路内停车 1 小时收费 6 元，2 小时收费 16 元，路外公共停车场 1 小时费用 5 元，2 小时费用 5 元，3 小时费用 7 元。由此可见，我市中心区路内收费定价基本合理，路外公共停车场收费定价过低。由于我市路内停车收费均为人工收费，道路停车累进制的计时收费方式形同虚设，此外，中心区路外公共停车场过低的收费定价也使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未能真正发挥作用。

分区域制定收费标准主要是提高一类区域公共停车场停车收费标准，保持二类区域收费标准基本稳定，适当降低三类区域停车收费标准。建议对道路停车继续实行阶梯式计费方式，体现停车时间越长收费标准越高，以加快车辆流转、提高泊位利用率。对停车矛盾突出的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场，可允许经营者提出申请经市价格主管部门确认实行阶梯式计费方式。建议一类区域路内停车以 2 小时支付 20 元左右停车费用，路外停车以 2 小时支付 15 元左右停车费用计。

4. 用现代科技手段，促进静态交通管理信息化、智能化

依据国内外多个城市停车场管理经验，可以从技术层面解决收费管理中存在的“收费难、收费乱”问题。建议结合常州市智慧城市建设和加快市内公共停车场站电子收费设施的配设与现有电子收费系统与设备的更新改造，建立停车信息管理中心，推进静态交通信息化建设，实施静态交通智能化管理。从技术层面规范停车管理行为，一是逐步取消人工收费，普及电子收费，变“人管”为“技管”，有效防止违规收费，从程序、技术上克服收费的随意性，提高收费管理的透明度；二是加大对停车诱导设施投入，及时提供停车设施信息服务，使驾车者能根据停车场信息，合理安排时间，计划出行方式。

如有条件设置路内泊位的道路，建设路内停车自动计时收费系统，实现自动计时收费，提高路内停车泊位的利用率，避免长时停车；在城市中心地区，建设公共停车诱导系统，统一标志标识，扩大诱导范围；同时开发车载交通诱导设备，提高诱导效能。停车场也必须采用高科技来提高管理效率，包括停车设备、等级、价格设定和快速收费系统，利用高科技提高停车场的管理服务效率和水平，有效改善停车状况，优化道路通行状况。

5. 建立收费监督巡查与评估机制，以查促管，以评增效

管理要出成效，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建立收费监督巡查机制。建议由市物价局牵头，会同工商、停车场管理专门机构等部门开展不定期的收费督查，作为停车收费管理的主要责任部门，

物价局应不定期组织对停车场的收费情况进行监督巡查，并对在督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经营场站进行即时处罚，视情节轻重给予督促整改、通报批评、罚款、停业整改、吊销营业执照等不同程度的处罚。只有通过建立收费监督巡查机制，以查促管，会同信息管理中心相关数据的分析核查，严格执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乱收费问题，切实提升停车收费管理效能。

6. 创新管理模式，促进停车场管理产业化的步伐

对公共场所和路段的停车场通过招标的形式向社会公开拍卖，所有道路停车区段和泊位收费都必须及时足额上缴财政专户，定期接受监察、审计，并且应该统一制定道路停车收费支出管理办法和使用计划。对投资者建设的停车场，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统一领导，按规定收取费用。制定停车场的操作规程，规定停车场存取车辆的程序，以及出现问题后的赔偿标准和具体办法。把停车场的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权部分转移到私营企业，政府主要对经营者实施监督和政策调控。使公共停车场的管理达到一定的专业化程度，实现产业化的跨越，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公共停车场管理模式。

二、常州市区公共停车场汽车停放收费策略分析

常州市作为大型城市，土地利用相对紧张，属紧凑型土地利用形态。单中心的城市形态结构使得中心城区压力严重，潮汐现象十分显著。而目前常州市居民出行方式仍以非机动车和公交车出行为主，占总体出行方式结构

比例的35%以上。在机动车出行方面，主要以公共交通和小汽车交通为主，其中公共交通比例大约为35%左右，小汽车交通比例大约为19%左右。且由于轨道交通仍未成网，公共交通方式仍以常规公交和BRT为主，城市交通总体的发展策略为限制小汽车使用，提高公交分担率，缓解交通拥堵。总体来看，常州市目前的交通结构基本符合陆建博士所描述的大城市的第二种类型。因此，结合常州市目前的交通现状，可确定现状水平下常州市合理的交通方式结构如表所示。

现状合理交通方式结构

交通方式	公共交通	小汽车	非机动车
结构比例	45%	20%	35%

根据现状合理的交通方式结构，以公共交通分担率为目标，根据模型的设定，可知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要达到45%的公共交通方式分担率，一次的平均停车费用应为=16.3元。

又从调查数据中，可知平均停车时间=1.6h。根据公式可知城市机动车的停车费率为=10.19元/h。

由于调查样本较少，未将路边停车场与路外停车场的调查问卷区分，而常州市路边停车现象严重，有20%的私家车出行者选择将车停放至不收费的路边，为吸引更多的驾驶者停放在路外公共停车场，路外公共停车场的停车费率应在保证发挥交通调控作用的同时，尽可能增加停车企业的经济收入，此时取上限值，即=1.5。根据公式(4-6)，可得路外公共停车场的调控费率=8.13元/h。

根据停车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以及行为模型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在停车价格达到 12-20 元的区间内，随着停车收费价格的提高，继续选择小汽车出行的比例逐渐减少，选择公交或非机动车出行的比例逐渐增加。

(2) 选择小汽车出行和选择其他方式出行的平衡点为 15 元左右，即此时原来的小汽车出行者中可以有约 50% 的人转向公交或非机动车或者出租车出行。

(3)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发现与平日相比，非工作日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小汽车出行，即使需要支付较高的停车费用，在相同条件下，高收入者继续选择小汽车出行的意愿明显大于低收入者，在公交服务水平提高的情况下，继续选择小汽车出行的意愿明显低于公交水平不变的情况。所以常州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大环境下，是可以抑制小汽车出行的。

三、常州市市区公共停车场汽车停放收费方案建议

1. 区域划分

由市公安局会同城市管理、交通、价格主管部门，根据交通拥堵状况等因素进行区域边界与范围的认定（专项研究），并建立停车收费区域划分动态调整机制。

建议市区范围内停车收费区域分三个等级，即一类区、二类区、三类区。建议将常州老城区、武进老城区与新北商业中心区确定为一类区，一类区为调控区，对该类区域实行较高的收费标准，鼓励公交出行，减少停车供给，

降低动态交通压力；二类区为供需平衡区，该区域鼓励公交出行，同时满足近期小汽车停放需求，该类区域以现行收费标准为主要定价依据；三类区为一般区。



市规划院交通所建议划分区域

2. 收费方式

一类区采用计时收费，二类区以计时收费为主，三类区以计次收费为主；一、二类区路内停车白天采用计时收费，夜间采用计次收费形式。目前保留人工收费形式，2—3 年内逐步取消人工收费，普及电子收费形式。

3. 计费单位

一类区路内停车计费单位由“半小时”调整为“15 分钟”，同时把一类区公共停车场计费单位从 2 小时缩短为 1 小时。

4. 收费标准

城市公共停车场站机动车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制定按照补偿合理成本、依法纳税、保本微利的原则，结合停车场所在区域、停车场站类型实行差别化定价。

调整优化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后，对一类区域内停车矛盾突出的区域实行较高的收费标准，形成三个等级的道路停车收费区域。在停车场收费上，按低于同类区域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的原则

制定。

建议一类区域路内停车以 2 小时支付 20 元左右停车费用，路外停车以 2 小时支付 15 元左右停车费用计。

建议将道路违章停车罚款标准由现 50 元调整至 100 元。

常州市区机动车道路停车位收费标准

车型	区域等级	收 费 标 准		20 时—次日 8 时 (元/辆·次)
		8 时—20 时 (元)		
		首小时内	首小时后	
小型车	一类区域	2/15 分钟	3/15 分钟	5
	二类区域	2/15 分钟	3/半小时	
	三类区域	1/15 分钟	2/半小时	

具有垄断性质的配套停车场、公共(益)性

单位配套停车场、政府财政性资金投资的

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

车型	收 费 标 准
小型车	一类区域不低于 8 元/辆·小时，二类区域不低于 5 元/辆·小时，三类区域维持现行收费水平。

5. 收费监督

监督主体：市价格主管部门是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市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制定市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并对市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实施监督管理。

监管内容：持证收费、票据、明码标价。

监管方式：市物价局牵头，会同工商、停车场管理专门机构等部门开展不定期的收费督查。

6. 处罚

由市公安局牵头，会同价格、城管等部门制订具体处罚细则。对在督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经营场站进行即时处罚，视情节轻重给予督促整改、通报批评、罚款、停业整改、吊销营业执照等不同程度的处罚。

课题组成员：蒋筱瑜、王浩

裴国忠、王林海、陆丹丹

(责任编辑：李军)

加快推动金坛工业园区发展新跨越的思考

虞乐

工业园区是一个地方新型工业发展的先导区、投资环境的示范区、科技创新的密集区，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招商引资的主要平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主战场。工业园区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上起着重要作用，深受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一、新时期金坛工业园区发展的主要特点

金坛工业园区自上世纪末开始起步，在第一轮乡镇行政区调整后，金坛共有 15 个镇，各镇开始有意识地发展自己的工业园区，形成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自发发展格局。2003 年，国务

院开始清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对乡镇工业园区进行了整合归并。金坛在开发区外，重点规划了金东、金西两个重点工业园，并保留金城镇、直溪镇的工业园区，但不再扩大。由于政策和规划的调整，金坛工业园区的发展显得较为缓慢，且落后于常州其它区、市。

2013 年起，金坛紧紧围绕“常金一体、东扩南移、苦干三年、强基进位”的总体发展思路，抢抓县域经济设发展机遇，克服资金短缺等种种困难，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秉持以规划建设为先导，以招商引资为途径，以项目开发为统揽的理念，结合各区镇实际，

利用资源优势、交通区位优势，切实推进各区镇园区建设与发展，掀起了工业园区新一轮建设发展的高潮。

1. 开发规模明显扩大

为了增强金坛各镇发展后劲，除尧塘镇以外的其余六个镇都要建立工业园区，如今，各园区道路等“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到位，绿化、亮化等园区形象大幅提升。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建设，截至 2014 年年底，各区镇工业承载面积扩大到 13.46 万亩，其中建成面积 5.94 万亩。分别比 2012 年年底扩大了 5.91 万亩和 2.76 万亩，将近翻了一番。

2. 载体效应逐步显现

各区镇园区内工业标准厂房和邻里中心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之中。各区镇已建成标准厂房 40.3 万 M^2 ，其中开发区 26 万 M^2 、金城镇 8 万 M^2 、儒林镇 5.4 万 M^2 、薛埠镇 0.6 万 M^2 、朱林镇 0.3 万 M^2 ；2014 年开工建设标准厂房 65.44 万 M^2 ，其中开发区 22.41 万 M^2 、金城镇 26.6 万 M^2 、薛埠镇 7.11 万 M^2 、直溪镇 6.15 万 M^2 、朱林镇 3.17 万 M^2 。至 2014 年年底，金城镇将有近 25 万 M^2 的标准厂房建成竣工并投入运营。儒林镇 1.97 万 M^2 邻里中心已全部封顶，进入装修阶段。薛埠镇 0.38 万 M^2



和直溪镇 4.1 万 M² 的邻里中心建设正在加紧推进。

3. 入驻项目质量不断提升

随着载体建设的不断完善，项目逐渐向园区集中。在建 369 个工业项目中，除盘活存量和现有园区外企业技改项目外，有 246 个项目在各区镇园区内建设，集中率达 66.67%。其引进项目涉及轨道交通、汽车整车及发动机等零部件、新型金属材料、智能数控设备、精密机械加工、成套装备制造等行业，部分项目产品或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二、金坛工业园区建设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目前，各区镇的工业园区已初具形态，但一直以来金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工业总体规模小，经济增长缓慢，政府财政收入相对匮乏，民间资本积累规模小，资金、中高级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缺乏，这些现实因素直接影响了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从各园区发展情况来看，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过短，资金运作困难，管理体制不畅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园区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瓶颈。

1. 工业园区产业同质竞争且尚未形成产业链

金坛产业集聚区多是脱胎于旧有的工业园区，集聚区数量多但布局分散。在招商引资时，各区镇各自为战，只要引进项目落户即可，容易出现“捡到篮子都是菜”的情况，缺少必要的产业发展规划。工业园区内原有的企业包括新引进的部分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组装加工的多，自主研发的少，加之缺乏引领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分工协作难以

形成，无法引领整个产业向前发展。例如，金坛现有大小各类光伏及配套企业 70 多家，大多为中小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差，这种同质化竞争实则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另外，各园区上下游产业和关联产业薄弱，产业链之间互动优势未能显现，这也带来了基础设施配套或不足或浪费等问题。尽管这两年政府在产业链发展上加以重视，但效果暂不明显。

2. 工业园区债务沉重且融资能力有限

随着园区建设的不断推进，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不断增大，贷款利息负担逐渐加重，资产负债率过高导致平台难以承担园区建设和管理的融资任务。一方面，工业园区债务包袱沉重。各区镇大规模的动迁、安置以及园区的大开发大建设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加上历史债务，可用财力难以保障园区的正常运转。由于贷款期限通常为 2-5 年，那么未来两年还将迎来偿债高峰，而现有的不少融资平台仅有一个“壳”，偿债能力不强，往往拆东墙补西墙，借债还债。另一方面，银行融资难。国家信贷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国发〔2010〕19 号文件出台后，金融机构表现出相对谨慎，信贷规模收缩，一些项目从国有银行难以取得贷款，转而向民营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机构融资，成本在 10% 左右，高的达到 11.5%。资金问题仍是制约工业园区建设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瓶颈。

3. 工业园区专业人才缺失且缺乏强效管理

工业园区的建设激发了金坛市广大干部群众新一轮干事创业

的热情。各镇园区的全面推进，这在金坛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大动作。围绕加快发展的主基调，党员干部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在推进加快发展中发挥作用、体现作为、树立形象，形成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但是，从各区镇园区后期的发展和管理来看，仍缺少三支专业队伍。一是缺少大量的专业招商队伍，已有队伍中既清楚市情、本地产业导向、行业规划、优惠政策，又懂得研究客商心理，分析客商需求，熟练运用谈判策略、技巧的人才为数不多。二来缺少专业金融人才，不少园区的相关负责人鲜少和金融机构打交道，不清楚各家金融机构的不同特点，缺乏融资规划，等需要贷款时，往往许多要件缺失，难以满足银行要求。三来缺少专业管理人才。专业管理水平较低，规划编制、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力量普遍薄弱。目前各区镇园区虽然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但管理协调的职能和手段有限，有关部门在推进园区发展中的职责和任务划分不明确，促进园区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尚未建立，科技、金融、人才、信息、居住、交通等服务体系不健全，这也导致了园区内社会活力不强，不利于园区和集镇的良性互动发展。

三、完善金坛工业园区发展和管理的几点建议

工业园区的建设是推进金坛实现跨越发展、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的迫切需要。如何增强工业园区的内部活力，以园区建设来促进工业经济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产城融合，这

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1. 培育主导产业，做长产业链条

做好产业规划。各区镇工业园区在布局时，要结合实际，合理谋划，不能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老路，要依据资源区位条件、产业发展情况和市场前景，通盘考虑，增强规划的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和政策性，协调各产业的健康发展。

加大招商引资。利用各种途径手段扩大工业园区的影响力，围绕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着力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投资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好项目，从而提高园区后备项目质量。值得一提的是，众泰汽车项目的引进将成为金坛新的支柱产业，也必将吸引国内外汽车整车和关键零部件大型企业来坛投资。

给予政策保障。优先支持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聚的项目，在项目申报、土地供应、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积极保障，推动产品升级换代，逐步使各园区特色更加鲜明、布局更加合理。

2. 拓展融资渠道，破解资金难题

发挥政府作用。充分发挥政府组织、协调、服务职能，举办融资洽谈会，促进银企对接，向上争取更多的融资政策。成立金坛国有控股公司，做大做强一家平台公司，在全市范围内统筹安排一切优势资源，并建立良好的公司规范制度，严格按照公司法运作，按照公司法搭建组织架构。借助企业债券、信托产品、理财

产品、银行票据等金融工具，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吸引社会资金。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按照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的要求，将园区融资项目按照非经营性项目、半经营性项目、经营性项目进行分类，综合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资金的引导、扶植、激励与放大的杠杆作用。

3. 加快人才引进，服务园区发展

组建精干的领导队伍。从战略发展高度，改革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着重在发展市场经济、驾驭工业园区各项工作能力、表现和业绩上，大胆选拔、积极扶持，放手重用，把懂经济、有活力、组织能力强的干部摆在分管工业的岗位上，为实现科学战略管理提供高质量的组织保证，为金坛未来的发展培养干部梯队。

吸纳专业技术人才。对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可采取增加优惠条件、提高人才待遇等方式进行招考，尤其是吸引部分有职称、有经验的人才到园区相关机构工作，提升服务园区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以人才带动重大项目的完成，促进产业的发展。

4. 理顺管理体制，完善配套服务体系

创新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创新是工业园区发展的一条生命线，国内大多数产业园区都在采用政企联合型管理体制。金坛各区镇工业园区的管理主要以政府为主导，由政府或政府组建的专门管理部门——管委会来对工业园区

的日常事务进行管理。这就容易导致机构膨胀，办事效率低下，服务不够专业。因此，还应有一个园区发展公司之类的专门机构负责并独立运营，负责园区内的具体管理事务，实现园区内的高效运作。

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根据不同园区的特点，抓好园区道路、电力设施、自来水管网、雨污水管网、通讯线路、天然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医疗、教育、金融、文化等生活性服务设施，形成产业空间与社会空间的融合，促进工业化城镇化融合发展；建立科技、信息、融资、评估、检测等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完善运输仓储、信用担保、信息交流、产品检验检测等现代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综合投资环境，让他们能真正感觉到“进得来，留得住，活得好，长得壮”。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展望未来，“十三五”规划激情开局，金坛的经济发展也将进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期。从工业园区的发展来看，依托工业园区发展工业，是金坛战略性方向和永不动摇的决定，是一项推进金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美好金坛”的重要举措。立足新起点，金坛工业园区的前进路上仍需攻克诸多难题，需从多方面入手，积极采取多项措施，保证园区更好地发挥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进一步推动金坛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金坛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张步东)



常州实施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探索及思考

田 泽

一、常州实施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机遇与挑战

(一) 面临的机遇

1. 常州实施历史性跨越的新的机遇

国家级苏南示范区建设给常州“中部崛起”的历史机遇，常州市应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实现跨越的机遇：如其中常州市有 50 个大项目纳入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国家战略规划。升级版的常州开发区规划：包括 1 核 2 区 8 园，常州市（包括金坛和溧阳）国家级、省级开发区迎来进行扩展和升级的机遇。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如奔牛机场迎来发展机遇，机场扩建后，年吞吐能力得到 33 万人次。增加常州奔牛机场国际国内客货航班。常州过江通道建设——直接提升常州对苏中、苏北的辐射能力。

2. 世界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迁移

从 20 世纪末开始，世界制造业大举向中国迁移，各个发达国家的跨国制造企业纷纷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这在客观上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和速度，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契机，常州的制造业发展也受到这种影响。

3. 国家政策的支持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要求立足国情，努力实现重点领域快速健康发展，其中规定要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要求重点发展以干线飞机和通用飞机为主的航空装备，做大做强航空产业。积极推进空间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卫星及其应用产业发展。依托客运专线和城市轨道交通等重点工程建设，大力发展轨道交通装备。面向海洋资源开发，大力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强化基础配套能力，积极发展以数字化、柔性化及系统集成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制造装备。并且常州市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具有较好的基础优势，所以我们更应该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常州市优势产业。

4. 上海自贸区的成立

上海自贸区集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及国际航运中心于一体，势必将会对临近的经济体产生辐射，推动长三角区域分工和联动发展。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中，上海的中心地位通过自贸区得到强化将深刻影响周边经济体的制造业发展。根据“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原理，上海作为长期为长三角地

区提供降低交易成本的经济中心，其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江苏、浙江、安徽的现代制造业就越发达。而常州紧邻上海，更能在涉外经济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抢先一步，进而推动开放型经济全面升级。

5. 城市空间发展机遇

与发展常州现代制造业相配合的是，2005 年常州市开展了常州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其中包括区域发展战略、市域空间发展战略、市区空间发展战略和旧城空间发展战略，建设用地正逐步走向集约化使用。随着常州市空间结构的日趋合理，各个区域制造业的发展重点愈加明确，从而促进区域经济良性发展，并使常州现代制造业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 挑战及问题

1. 新兴产业核心技术难以掌握

常州具有规模优势的太阳能光伏产业中多晶硅提纯技术掌握在国外七大制造商手中；新材料产业缺乏核心技术；集成电路核心技术掌握在跨国 IT 巨头手中；物流网行业在线操作系统、云计算、云储存等方面的核心技术均由发达国家的企业掌控。

2. 存在产业同构，城市同质

化竞争激烈

苏南五市间存在着产业间同质化竞争问题，发展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等方面尤为突出。如在竞相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等方面也存在苏南城市间的同质化竞争。

3. 竞争格局的加剧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使得产品的生命周期大幅缩短，同时也使得企业的更新换代更加频繁，不断有新老企业进出市场，企业间的竞争格局不断加剧。另外，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本地企业并不能独善其身，因此，本地企业有必要采取应对措施以保证经济继续稳定发展。

4.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1) 区域生态空间格局不完整，受损生态系统修复任务重。

从空间开发角度，结合主体功能区和生态功能区划，分析城镇化建设及开发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评价受保护区域实际保护水平，分析区域生态用地面积减少的趋势和生态斑块破碎化程度。

(2) 产业和人口高度集聚，重工业化带来区域污染负荷大。

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三次产业变化趋势，着重研究工业经济结构特征、工业经济密度和单位国土面积污染负荷，分析化工、印染、造纸、火电、钢铁重点行业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清洁生产水平、污染物排放量等。

(3) 环境风险处于高暴露水平，风险管理和应急形势日趋严峻。

从环境目标敏感性、产业布局、风险防控体系等方面，分析

常州市地区的环境风险隐患。研究危险废物、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险化学品等环境风险以及太湖流域累积性环境风险。市内依旧存在一批黑臭河道、河塘，大概占河道的 1/5。部分河道因污水管网建设不到位，部分因工业废水的直接流入而影响水质，还有一些生活污水和河道淤积也是造成河道污染的主要原因。

二、常州实施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战略地位与目标

(一) 战略定位

1. 战略定位

(1) 依据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总体战略定位和常州市自身基础及发展需求，围绕把常州建设成为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和苏南创新型城市群有特色、有高度的一极的总体定位，具体规划并努力实现如下战略取向：

(2) 实施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常州方略”，成为苏南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最具成长力的一极。

(3) 依据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整体战略和常州已有优势，坚持主动融入、分类参与的战略取向，打造前瞻性培育、主导性发展、竞争性参与、借势成长的多类型、立体式、高成长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完善具有“常州模式特征”的自主创新机制，成为苏南深化改革试验区最具创新活力的一极。

(4) 探索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常州版路线图”，成为苏南创新驱动引领区最具创新效力的一极。深入实施“常州版”的创新发展路线图，以创新驱动、产业互动和市场拉动及其互动为主

线，以提高创新驱动力、促进产业有效互动、攀升产业价值链为着力点，大力增强产业创新发展效力。

大力推进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坚持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不断深化“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的创新模式，继续完善筛选培育、利益共享、长效合作、中介服务、诚信管理。

(5) 建设科学、低碳、绿色、城乡一体发展的常州，成为苏南现代化建设先行区最具发展潜力的一极。积极探索科学发展方式、和谐民生之路、两型社会创建、城乡一体发展的新途径和新举措，明显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加速推进城乡建设一体化，持续提升社会发展潜力。

(二) 发展目标

结合国家关于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规划和江苏省及常州市“十二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制定常州市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目标。“十二五”期间，基本形成具有自身特色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创新型产业体系、有效的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路径、完善的自主创新机制和科学、和谐、绿色、城乡一体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格局；主要创新指标增速全面领先，重要人均创新指标全面前移，成为全省开放集聚和利用创新资源能力最强、协同创新本领最大、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率最高、创新政策环境和文化最优的创新型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 135000 元，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5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 46% 以上，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3.1%，科技进步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详见表1）。

表1 常州市“十二五”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目标

指标	江苏省①		常州市②		五市中位置③
	2010年	2015年	2010年	2015年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52840	100000	67327	135000	3→3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41.6	53	40.6	50	4→2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	33	45	32.08	46	5→3
研发投入占GDP比重（%）	2.1	2.8	2.33	3.1	4→2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54.12	60	—	60	→3
城市化率（%）	60.6	68	62	70	4→4

三、常州实施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对策

（一）构建区域协同、产业互动的工作体制及运行机制

建立苏南自主创新产业园区网络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推进园区区间、产业间、产业内的协同创新；以企业为主导，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产业内技术、产品、企业间的互动。突出协同创新，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城市群协调发展。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城市分工研究，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城市群落。就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把一体化发展的苏南经济板块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率先基本现代化区域和中国最具竞争力城市群来建设，如何做到苏南“三位一体”发展是关键。

（二）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

与此相适应，成立常州市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实施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市有关部门、各区（市）、主要开发区领导为成员，全面负责实施相关工作。在科技局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落实具体工作。要继续提高“科教城”集聚高端创新资源的活力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及辐射力，围绕产业创新发展需求，探索与其它园区共同集聚、协同开发、合作转化、

顺畅转移的开放型创新体制和机制，促进创新成果的溢出和辐射。

（三）做好城市的功能定位和现代化先导区的规划

1. 常州市功能定位。

与苏南其它城市相比，常州市应成为智能先进制造业装备基地、太阳能光伏产业基地；石墨烯、3D打印等新材料产业基地；创意文化基地和现代服务业产业基地。

2. 做好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现代化先导区的规划

抓住机遇，发挥优势：用大智慧，大气魄，大视野谋划发展。狠抓产业园去建设和攻坚：建议常州市以科教城、综合产业开发区、主题创新型产业园三个层次规划创新型产业园区网络。作为第一层次的科教城是全方面向园区网络的中心创新源，是常州高端创新资源的聚合区、创新成果的创造及辐射源、科技创新服务的高地、前瞻性培育产业的策源地。

优化常州市产业园区的创新布局，原来是1核2区8园，8个园面临转型升级，由单一的产业园向专题园、科技园、生态园拓展，优化产业布局打造我市已形成“一核、两区、三园、多基地”的总体科技创新布局。完善“一城双高六区九园”格局，构建协同发展的创新型产业园区网络

各类国家和省级开发区为第一个层次，主要包括双高六区即常州国家高新区、武进省级高新区、武进经济开发区、溧阳经济开发区、金坛经济开发区、天宁经济开发区、钟楼经济开发区、戚墅堰经济开发区。

第二层次是创新型产业园区网络的区域中枢，它接受和传递

科教城的源头辐射，提供产业发展的综合性、基础性条件，实现并扩展创新成果的产业化，为主题创新产业园创造发展环境，为借势成长类产业提供发展平台；

第三个层次为主题创新型产业园，是创新型产业园区网络的基础节点，主要包括创意、智能装备、光伏、生物医药、新能源车辆、风电装备、半导体照明、功能新材料、轨道交通等创新产业园。它主要承担主导性发展、竞争性参与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促进其实现产业有效集聚及与其他产业的良性互动，对创新型产业园区网络起到基础的支撑作用

要继续提升“双高六区”的区域中枢作用，加强创新创业公共平台的建设，提供产业及其企业规模化发展的政策和服务环境，增强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的能力；

（四）以培育领军型企业家、创业人才、创新人才为重点，培养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

建设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培育发展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创新性产业体系，与以往跟踪发达国家轨迹、集聚和扩展成熟产业不同，需要一批具有广阔视野和战略意识，能把握经济、科技发展态势，主导创新活动的领袖型企业家；需要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创新成果、强烈的市场意识和相当的管理能力，能率领团队拼搏的领导型创业人才；需要一批富有宽广的科技、产业知识和经验，能够对某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及成长过程有透彻了解和运作能力的领域性创新人才。常州市应坚持以吸引、培育领军型的企业家、创业人才、创新人才为重点，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的布局和工作，打好扎实的智力支撑基础。要依托科教城优势，完善嵌入式教育模式，为产业创新发展培养充足的高素质创新技能人才，把常州科教城建成我省乃至全国的高层创新技能人才的培养基地。

（五）狠抓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突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瓶颈制约

借实施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之机，顺新一轮改革大潮推进，常州和苏南总结自身，放眼世界，积极作为，有更好的基础和条件深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全省在全国率先打造现代服务型政府。关键是要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上取得显著的进展与突

破。解决政府及其部门的功能错位还很普遍、突出，集中表现为“越位”和“缺位”。常州及苏南地区的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强，公共投入力量大，不足之处是对竞争性、盈利性的事务参与较多，特别是在有关产业开发经营方面。今后苏南地区的政府要将这类竞争性、盈利性、私人性的事务放手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和公民，以便腾出时间精力和物力财力着力加强、改善和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

（六）人的现代化

实现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富足后，如何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应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持续发展、永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这对现代化建设具有纲领性、指导性，给我们清晰地描绘了未来的发展路径。常州谋划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应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充分尊重人民意愿，在现代化指标中充分体现与民生和人的现代化。常州应以推进现代化综合指标体系和国家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协同创新纲领引领现代化建设实践，大力推进人的现代化的进程。通过推进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现代化进程，加强教育资源的投入，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文化素质和现代公民意识。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责任编辑：陈满林）

（上接第8页）

合理规划教育设施和师资的建设；一方面要针对性地新建或扩建一批幼儿园和小学，特别是在一些新建的居民集中区以及教育资源相对较为缺乏的城郊地区；另一方面要通过师资资源的调配、流动等各种方式促进教育资源区域的公平配置，推动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三是要加强生育保险基金使用管理，确保公共保障的全面落实。针对单独两孩新政实施后短期内可能会出现生育高峰以及常州企业缴纳生育保险费的比例由0.8%降至0.5%导致的“人员增加、保费减少”的现实状况，未雨绸缪，及早主动做好生育基金征收、使用等情况的预测；遵循“以支定收，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积极强化生育保险基金的筹集，不断扩大覆盖面，强化基金征缴，努力做到应保尽保，确保应收尽收；按照规定依

法、合理规划安排生育保险基金的支出项目，开展生育基金节余情况的盘算和预征收情况的预测，做好基金使用的风险控制；研究生育保险调剂金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全市生育保险不同统筹区合理使用调剂金；积极加强与同级财政部门的协调，确保在基金不足的情况下财政补助的办法，切实保障生育期间的家庭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需求。

6. 积极引导和推动婴幼儿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一是要加强对婴幼儿相关产业和市场的规范化管理，规范婴幼儿产品的质量，确保产品安全，强化婴幼儿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标准和准入制度；对婴幼儿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行监管，加大价格执法力度，从快从重打击各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价格违法行为；加强对家政服务中介机构的规范化管理，逐步推进

家政服务员持证上岗制度，促进家政服务的职业化发展；通过严格规范婴幼儿消费市场和科学引导健康合理消费促进婴幼儿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二是要积极鼓励本土婴幼儿相关产业的发展，重点培育一批婴幼儿产品生产企业和知名产品品牌，培育形成一批规模化的、高品质的婴幼儿教育培训机构；引进一些知名企业，积极推动跨区域联合和品牌合作，带动常州本土婴幼儿产品和服务相关产业的发展；针对二孩生育家庭大户型住房的需求，在房地产总体政策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放宽对二套房购买和大户型住房购买的政策限制，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

课题组成员：周兰珍、汪晓东、叶英姿、陈杰、冯英华、谢金楼、卢雷、慧丽、马剑锋

（责任编辑：叶英姿）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发展策略研究

——以常州市为例

张步东

制造业服务化，是指企业将以产品为中心的制造业向服务增值延伸，不再是单一的产品提供者，而是集成服务提供商。制造业服务化不仅是工业调整结构的有力措施，而且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途径。制造业服务化的形式广泛，从产业链顺序来看，产业链前端的的服务主要有产品研发设计、市场研究、咨询服务等，产业链后端的服务主要有零部件定制服务、集成服务提供商、整体解决方案、设备成套、工程总包、交钥匙工程、再制造、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优化等。我市目前已成为制造大市，但总体上看，我市制造业大而不强，仍停留在以生产制造为主体的模式中，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如何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当前常州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

一、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是常州市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是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从国际来看，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引领制造业产业升级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很多知名的跨国

企业集团，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通用电气公司（GE）、耐克（NIKE）、罗尔斯—罗伊斯航空发动机公司（ROLLS-ROYCE）、米其林轮胎等，都已成功转型。它们原来的主营业务集中在制造业领域，但当前都已实现由传统制造向制造服务业的转型。IBM曾经仅是硬件制造商，经过十余年的业务整合，现已成功转型为全球最大的“提供硬件、网络和软件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在IBM全球的营收体系中，目前大约有60%的收入来自IT服务。再比如，耐克是一个知名的运动品牌，但在生产上采取了虚拟化策略，所有产品都不由自己生产制造，而是外包给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的生产厂家，耐克公司则主要集中人才、物力、财力开展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和品牌维护。因此，尽管耐克是制造业，但经营业务却是服务业。同样情况，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服务营业收入占三分之二，英国壳牌公司加油站收入约有二分之一来自便利店。国内许多制造型企业也逐渐开始实施服务化战略，陕鼓、东方电气、上海电气等装备制造型企业也结合自身优势，开始实施“服务化”转型。海尔

集团已拥有9万辆汽车、18万人从事家电售后服务，获得了社会赞誉。

(二)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一般而言，产业链中的服务环节利润率通常要高于制造业环节，因此形成了所谓的“微笑曲线”理论：研发和市场是价值链中利润最丰厚的环节，而这恰恰是服务化转型的重要领域。近几年，受制造业利润不断下滑的形势压迫，在国内外服务制造领域成功企业的示范效用下，常州各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意识明显增强，许多企业高层管理者都十分重视拓展服务业务，开始深入研究借鉴国内外同行的先进经验，企业的服务化转型初见成效。但从调研结果来看，目前我市不少制造企业的服务业板块利润率都低于制造业务，影响了企业对服务业务进行投资的积极性。出现这种“苦笑曲线”原因有：某些制造业（如机械、化工）受到一定程度的行业保护，服务业领域的市场竞争激烈，服务行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等。要提高我市制造业的盈利水平，必须推动企业从单纯生产型向制造服务型转变。

(三)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是

常州市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常州是传统工业城市，制造业是我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常州制造业占全市 GDP 总量的比重长期保持在 50% 以上，仍高于三产 5 个百分点以上，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制造业仍将是常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常州商务成本的快速提高、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峻以及国内外竞争的不断加剧，我市在制造业领域的传统优势已难以为继，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求日益明显。要摆脱这种困境，常州制造业必须加快“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通过迈向“高端化”和“服务化”来建立新的竞争优势。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以及通过模式创新加快制造业向服务化转型都是常州经济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式。从长远来看，利用技术创新实现经济转型是常州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但技术创新具有较长的时间周期，且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而从中短期来看，利用业务模式创新实现制造业服务化是推进常州经济调整的诸多途径中更容易见效的方式。目前，我市在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工程机械和车辆、现代农业装备、数控机床及基础装备等门类齐全、上下游配套的产业特色和优势显著，常州西电、常州东芝、南车戚机公司、小松（常州）、常发、常柴、宝菱重工等一批企业在业内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成为常州市的“城市名片”，也具备了实现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客观条件。

二、常州市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制约因素

目前我市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制造业从制造环节向集成服务环节的延伸不够。我市一些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开发能力有所增强，但在价值链延伸、提供集成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零部件定制服务等方面仍显不足，为行业提供集成解决方案和系统服务的企业仍不多。另一方面，大型企业集团向新兴产业领域拓展和转型的力度不够，个别企业集团进入房地产业进行短期攫利，但对于那些真正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医疗健康、消费、金融服务等新兴高增长领域，开拓的力度则明显不足。

1. 信息化水平低，服务化转型缺乏支点。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获得制造产业链上的高额利润，主要得益于借助信息化技术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成为全球很多企业解决方案的提供商。相比之下，我市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信息产业加快发展和制造企业信息化建设加大投入的双重需要和双重挑战。特别是我市现有的天合光能、LED 光源检测两个国家级实验室，主要功能还仅限于产品检测，其它高端引领作用还远远未得到有效利用。

2. 人才供给不足，服务化转型缺乏引擎。针对研发设计、系统咨询与集成等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关键环节，自 2006 年 9 月起，常州就在全国、全省率先启动大规模领军人才引进工作，组织实施“千名海外人才集聚工程”，

2011 年 8 月，又进一步创新机制政策，启动实施了“龙城英才”计划和“金凤凰”计划，大力引进和培育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全市共签约落户领军人才项目 1250 个左右，引进落户由知名创投机构和常州市重点企业首先投资、人才投资基金和人才引导基金跟进投资的领军人才创业重点项目 110 多个，但整个常州地区不仅高层次研发机构仍严重不足，而且还不完全具备高水平人才生存和发展的“全生态”环境、“反磁力”能力不强，上海、苏州等地的“虹吸效应”使我市人才资源的稳定状态更加堪忧。

3. 产业集中度低，服务化转型缺乏引领力量。全球制造业服务化成功转型的大多是大企业、大集团。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会产生服务的“需求效应”和“溢出效应”。近年来，我市制造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形成了一批产业集群，在全国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在全国仍缺乏竞争力和一定的位置（在江苏省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百佳产业集群”名录 17 个产业集群中常州居然未有一个）。缺乏实力雄厚、能够支撑和带动行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大企业、大集团成为多年来困扰常州经济发展的痛，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常州市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

4. 创新能力不强，服务化转型缺乏核心竞争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核心部分主要体现在研发设计和新兴商业模式的运用。常州市制造业在创新投入和新兴商业模式探索上还存在较大差距。

即使是我市略有优势的机床制造业，其与世界强国在高端加工技术方面也存在较明显的差距，如加工设备的伺服电机、工作软件及关键零件的材料及表面处理技术等国内外的差距确实很大。以研发投入为例，2013年，我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2.5%，而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1.48%，相比之下，大众、通用等国际企业一般达到4.5%以上，差距明显。我市自日、德引进的磨齿机、车铣刨床等高端加工设备，基本都集中于少数几家实力、龙头企业，但有的机床上被制造商装有GPS定位与加工数据传达系统，造成企业严重受制于人。

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是由我市制造业发展的总体阶段所决定的。制造服务业对核心技术有较高的要求，只有掌握差别化的核心技术，才能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集成服务。但总体上我市制造业普遍大而不强，资金实力和行业话语权仍不足，难以提供行业独占性的产品和服务。这就决定了企业难以为用户真正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和交钥匙工程，而只能参与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另一方面，企业转型的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不足。应当说，企业都有积极谋求转型升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愿望。但拓展新兴业务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短期内无法收回成本，而且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较大，包括技术的市场风险、技术开发风险、经营风险等，这些风险是多数企业难以预测和承受的。由此，导致企业在转型升级和发展制造服务业

的过程中动力不足。

三、常州市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思路

1. 进一步解放思想，以观念变革引导转型。传统生产模式的惯性以及高层观念的前瞻性、包容性不够，导致很多企业没有从战略高度认识制造业服务化的重大价值。因此，要在全市加大制造业服务化的宣传和讨论，形成有利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强大氛围。同时，加大对服务化转型先进典型企业的案例总结和经验推广，使制造企业能够对服务化转型“听得到、看得见、学得来、用得上、见实效”，促进制造业企业眼睛“向外”，利用“标杆管理”推动服务化转型实践的发展和深化。

2. 进一步优化环境，以政策措施支持转型。与制造业创新相比，服务业创新在创新投入、创新过程以及创新产出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虽然我国有关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多，但较少涉及服务业的创新行为。与此同时，现有许多创新支持政策带有明显的制造业痕迹，不能适用于服务业创新实践。例如，在一些产业扶持政策中，政府都是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定比例进行配套，相比制造业，服务业的投入更多地体现在人力、信息、品牌、商业模式等“软投入”方面，固定资产投资较少，服务企业能从政府获取的资助也较少。鉴于制造服务业巨大的发展潜力，我市应大力推进大型制造业集团和制造业领域服务业的发展，将其

作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产业转型的重要着力点，将制造服务业作为新时期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纳入先进制造业发展规划纲要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纲要。对于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政府要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做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专项规划，进行统一协调。建立相关创新保护体系，通过健全技术服务认证体系、标准、法规与制度，有力保护服务化转型企业的创新成果，提高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意愿。

3. 进一步加大投入，以资源保障促进转型。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离不开人力和财力的支持。首先，在人才工作方面，进一步深化“龙城英才”计划和“金凤凰”计划，加快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相比制造业，服务业更依赖于人。常州的制造业服务化转型面临着人才和人力缺乏难题，尤其是缺乏既熟悉制造业务又熟悉服务业务、既精通生产技术又精通商务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常州制造企业中的服务业务管理人员多来自于制造部门，其知识结构与制造服务业务发展不尽匹配，影响服务业务的发展。因此，常州应加快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在高校中开设服务制造专业，促进专业的融合，培养一大批既懂生产制造又懂商务知识、既精通制造技术又熟悉服务流程的复合型人才；推进企业实训基地建设，促进高校与服务制造企业的人才培养对接；支持企业加快从国外引进服务制造业高级人才。其次，在资金方面，由于制造业服务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且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仅靠企业自筹资

金解决难度很大,应用好财税政策,有效引导企业资源向服务环节配置。鼓励和支持企业充分利用银行低息贷款、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支持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手段和金融信贷产品,设立帮助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引导专项资金,对重点行业、典型企业的转型项目给予重点支持。在向企业发出政府产业政策导向信号的同时,通过资金的“乘数效应”,聚合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形成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协同效应”。从而为制造型企业向服务化转型提供金融支持。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引入风险投资基金,以达到分担风险的目的。

4. 进一步真抓实干,以抓大带小驱动转型。要结合即将开展的“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做好相应的产业规划,选择有前景、有优势的产业作为开展转型工作重点。第一,行业层面统筹规划。合理进行产业比较和分析,寻找适合进行服务化转型的行业。第二,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只有较大型的企业才有足够的资金和实力开展工程承包、系统集成、设备租赁、提供解决方案、再制造等服务型业务。企业兼并重组的过程,既是对业务流程进行整合再造的过程,也为服务环节的开展提供了契机。

5. 进一步加强协调,以产业集群联动转型。产业集群中配套完善的企业可以让主干企业专注于核心业务,将制造环节外包,推进制造服务化程度不断提高。

鼓励发展纵向产业集群模式,主机和配件企业相互协作,领先者、跟随者、补缺者综合发展。在集群内通过动态联盟实现网络内企业间的协作,增加采购、研发、设计、虚拟制造、物流、营销等服务性环节的价值。

6. 进一步开发网络,以信息技术辅助转型。制造业服务化需要将信息技术广泛渗透于客户定制、产品设计、测试认证、跟踪服务、金融服务等环节。政府要引导和支持装备制造企业建立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信息化制造服务技术,包括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的信息采集技术、用户需求挖掘技术、知识获取与挖掘技术等。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常州市还需要加大网络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网络功能和业务承载能力,改善通信网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装备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顺利开展提供网络和技术保障。

7. 进一步加快创新,以企业为主深化转型。制造业的自主创新是推动装备制造业生产和服务发展的根本力量。要紧紧围绕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在持之以恒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吸引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强度之外,还需要认真做好以下工作:首先,要确立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推进建立和完善大公司的技术开发中心,加快国家级先进制造技术工程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建设。其次,建立协调、高效的自主创新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体

制机制,开展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的研究开发、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在此,把创新政策融合到产业、金融等各项政策中去。例如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在重大政府、公共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投标中优先采用自主创新产品,用创新基金引导各部门和企业的配套资金投入等。

8. 进一步适应形势,以放松管制助力转型。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将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催生出许多新兴复合型业务。目前,在我国许多产业和行业管理政策中,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做出十分严格的区分是不能适应产业融合发展形势的。例如,制造企业在向客户提供服务业务后,无法开具服务业发票,为此不得不针对每种服务业务成立一个相应的独立服务业法人实体,这增加了企业管理的复杂度。再如,制造企业进入网络信息服务业领域,往往难以获得互联网业务资质。这些现象表明:现在这种固化、条线分割的行业管理政策不能适应制造业服务过程中不断涌现的产业融合、业态创新需求,需要进行变革。还要加快标准规范体系建设,服务业标准化对于提高服务效率、保障服务质量、促进服务业整合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我国服务制造业务起步晚、发展快,行业标准的制定相对滞后,再有如设备检修、合同能源管理、制造业物流、车载信息服务等重点领域还存在许多标准规范的空白。

作者单位:常州市社科联
(责任编辑:罗志平)

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课题组



一、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1. 创新工作机制，强化协调配合。一是建立了食品安全监管协调机制。在市食品安全委员会设立8个监管专项工作组，明确各工作组分别承担相应的监管职责，协调内部的具体工作；由市食安办牵头，定期不定期召开会议，分析食品安全状况，研究部署监管工作，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and 重点任务督查，对监管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的问题，采用“一事一议”的办法，及时协调解决，做到既各司其职，又协作配合，形成监管合

力。二是建立了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落实机制。三是建立了食品安全应急机制。制订印发了《常州市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四是建立了食品安全监督网络体系。建立了1200人的基层协管员、信息员队伍，实现从镇、街道到村、社区的全覆盖，起到协助执法、隐患排查、信息报告、宣传引导等作用。同时，通过施行投诉举报办法、设立投诉举报和查处重大案件奖励基金等，调动社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工作和部门查处案件的积极性，增强食品安全防范意识 and 能力。

2. 认真履行职责，强化监督

管理。市农委、商务、工商、质监、卫生和食品监管等部门，按照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原则，根据监管工作的不同环节，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强化监管措施落实，着力抓好“五个环节”的监管。

3. 实施安全工程，强化专项整治。市政府连续5年将食品安全工程列为全市重点工程（工作），各相关职能部门同心协力，扎实推进。市食安办切实加强监测评估和风险预警，将省、市政府每年确定的评价性抽检任务下达到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部门，抽检范围涵盖食品种养和生产企业，以及农贸市场、餐饮单位、粮油企业等，抽检结果每两个月一次公布于常州晚报。2013年，全市共抽检2942批次，合格率为97.8%，超额完成市政府下达的2600批次抽检任务。每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专项食品监督性抽检，针对性的采取食品安全监督措施。对发生在外地且群众比较关注的食品安全事件，市食安办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及时组织预防性抽检、调整监管重点，并发布相关信息，消除市民疑虑，平稳社会情绪。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季节的实际情况，组织农委、商务、工商、质监、卫生和食品

安监,包括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部门开展各类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去年,重点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肉类肉制品专项整治,集中检查畜禽养殖、屠宰和肉类流通、加工等企业,严厉查处和打击了私屠乱宰、无证经营肉和肉制品等违法行为,有效推进了“放心肉工程”的实施。各职能部门按照市食安委的统一部署和各自的职能,分别开展了保健食品“打四非”、“瘦肉精”、“农资打假”、“水产品质量安全”、“查假冒、保民生、树诚信”、保卫校园食品安全等专项整治行动,以及瓶装饮用水、肉制品、白酒、含乳制品、食品添加剂等13项专项执法检查,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对强化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意识,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行为,建立健全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制度,确保人民群众放心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1. 体制不顺,职能交叉。目前,我市食品安全的监管体制是,市食安委总牵头,下设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食安办负责综合协调,从“农田到餐桌”的监管工作分别由农委、商务、工商、质监、卫生等部门负责。由于多种因素,2009年机构调整时,餐饮环节的食品卫生监管职能没有移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仍由卫生部门承担。由于这些部门的管理体制不一、隶属关系不同,加上法律对各个具体环节的划分不够清晰,一方面客观上造成了政出多门、职能交叉、重复管理,各职能部门站在各自的角度考虑利益和责任风险的现象(如豆芽菜到底是

农委还是质监部门管,前店后坊式的食品加工和销售是质监还是工商部门管,等等);另一方面,因界定不清而造成了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管理脱节、监督空白的现象。同时,各辖市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现行体制也不尽相同,金坛、溧阳、武进设有单独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北区是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直属分局,天宁、钟楼、戚区则在卫生局增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牌子,既无编制,也无专职人员。因而,市及辖市、区两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基本没有实质性的监管职能,仅以食安办的名义行使综合协调职能,工作难度大,且效果不理想。

2. 力量薄弱,矛盾突出。据统计,全市从事食品生产经营、餐饮的企业和个体户,共有10万多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店,甚至是小摊贩,不仅面广量大,而且比较复杂,极不稳定,监管矛盾非常突出。而现有的监管力量,包括食品生产、流通、餐饮等环节的监管人员仅171人(其中专职人员只有92人),基层一线的监管力量更显薄弱。新北区卫生监督所全所共14人,专职从事餐饮监管的为6人,面对全区4400多家餐饮企业的监管任务,只能停留在表面的应付,根本谈不上指导服务和长效管理。另外,分散在城郊结合部和农村地区无以计数的无证无照食品生产经营行为,更是难以监管。同时,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检验检测的水平不高,也是监管力量薄弱的因素之一。

3. 手段落后,风险增多。随着食品生产经营专业化分工越来越

越细,深加工的产业链越来越长,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越来越快,特别是制假掺假的隐蔽性和技术化水平越来越高,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更加复杂,风险明显增多。原有的突击式、运动式和“眼观、鼻闻、手摸”的传统监管方式、手段,早已无法适应。同样,现有的检测设备和能力也难以满足农产品、食品生产、流通中的质量安全检测要求,技术上更不具备对5大类重金属的常规检测能力。同时,检测成本高、送检数量少和日常抽检、突击抽检经费的不足,以及检测设备、技术和手段的不配套等,既造成监管技术上的脱节,又增加了潜在的安全隐患。

三、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几点建议

1.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着力构建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市政府要围绕建立统一权威高效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大胆实践,通过改革整合资源,促进监管,通过创新强化职能,转变理念,努力形成适应食品安全监管需要的指挥统一、调度顺畅、信息共享、处置迅速的运行机制。一要加快推进职能调整。按照《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和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办发〔2014〕30号)、《关于印发〈江苏省市、县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的通知》(苏办发〔2014〕31号),以及全省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认真组织实施,积极推进市及辖

市、区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职能的改革调整工作。一方面,要结合常州的现状和实际,研究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明确目标、方法、步骤,特别是机构的设置、职能的调整、人员的划分和经费的保障;另一方面,要统筹协调上下衔接,财政、编办、人社等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支持食品监管体制改革,确保各项改革措施按时按规落实到位,全面加强食品监管体系的建设。二有效整合监管资源。基于目前监管体制不顺、资源分散、各自为政的现状,要牢牢把握这次体制改革的机遇,根据国务院《指导意见》关于“将原食品安全办、原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和药品管理职能进行整合,组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科学整合相关部门的职能、人员和技术等资源,集中监管力量,减少和避免重复投资,提升检验检测的技术支撑能力。学习借鉴南京市的做法,整合工商、质监等部门监管资源,组建食品药品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挂举报中心牌子)和监督检查院(所)两个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分别专司行政执法和检验检测职能。整合法律法规赋予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能,在职能划转时对各部门的职责,按现行法律条款逐项界定,做到不重、不漏、不交叉,通过整合,明晰监管职责,理顺监管职能,实现全程无缝监管;整合监管档案信息资料,工商、质监、卫生等部门要认真做好各自的食品监管档案信息资料整理、交接工作,确保信息资料的完整,实现信息共享,从而打通监管堵点,提升监管效能。三要切实加强网络建

设。要以这次机构改革、职能调整为契机,理顺监管体系,健全基层监管机构,天宁、钟楼、戚区应单独设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应实行属地管理,各辖市、区对照市机构设置组建相应的行政执法机构和设定内设机构。同时,要按照重心下移、关口前移原则,重点加强基层监管执法力量,各辖市、区可借鉴南京江宁区的做法,整合相关监管资源,成立食品药品监督所,并按区域统筹设置食品药品监管派出机构,在乡镇(街道)设立工作站,配备相应的专职监管人员和必要的技术装备,填补基层监管执法空白,形成食品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体系。

2. 完善同管共治机制,全面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食品安全的监管,任何时候、任何阶段,都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食品安全的监管,不仅是政府或某一个部门的职能,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紧密配合,同管共治。首先要坚持政府主导。各级政府和食品监管及相关职能部门,是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待,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这不仅阐明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更强调了政府应负的责任。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一定要深刻领会、全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既要高度重视,高度关注,勇于接受考验,担当起食品安全监管的重任,更要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进一步明确

责任,强化意识,切实履行好监管职能,并注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加大渎职、失职的查处力度。同时,要不断创新理念,创新思路,建立健全更加完善、更加科学、更加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形成以事先预防和全程管理为特征的现代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市场规律、切合常州实际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新路子。其次要强化行业自律。所有从事食品生产企业(经营者),对食品安全承担第一责任。一方面,要通过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把各方面的约束和激励集中到生产经营者行为上,不断规范食品生产经营秩序,净化食品市场环境,帮助、指导食品生产企业(经营者)建立健全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制度,并以更广的视野支持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等发挥在法律实施中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引导企业(经营者)增强遵纪守法、依法经营的自觉性。另一方面,通过法制教育、典型宣传、行业自查、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等形式,不断强化食品生产企业(经营者)安全第一责任意识的意识,提升整个行业的法制观念、文明程度和职业素养,大力倡导讲规范、讲道德、讲诚信的行业新风尚。再次要形成社会共识。食品安全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千家万户、方方面面,关系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食品安全,仅靠政府监管、法律手段是不够的,必须全社会关注、全社会参与,形成全社会共治的环境。要把食品安全科普知识纳入国民教育范畴,充分利用新闻媒体、专栏专版等形式和阵地进行广泛宣

传,大力营造食品安全人人有责、人人监管的氛围;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奖励,包括对政府部门监管执法情况的监督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和市场效率,促进政府认真履职,加强监管,督促生产企业(经营者)崇尚职业道德、回归守法本分,提高质量管理水平,真正实现从政府到企业和社会的齐抓共管,共同治理。

3. 加强检测体系建设,有效提供食品安全监管保障。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是整个食品安全监管的技术支撑,对促进和保障食品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针对目前我市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不健全、不完善,检测资源分散,而硬件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重复投入的现象,结合体制改革、职能调整,根据食品安全监管的专业特点,进一步修订完善我市食品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发展规划,加大各类资源整合力度,健全食品检验检测体系。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推进政府检验检测机构建设,通过建立全市综合性的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完善技术标准和检验检测手段,充实专业技术人员,增强综合检验检测能力,避免重复抽检,节约检测经费,提高检测效率,更好地为我市食品安全行政执法、监测评估、风险预警、信息发布等提供有效服务,提高监管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同时,倡导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及各类社会力

量举办食品检验检测机构,督促、指导食品生产、流通企业加强检验检测机构建设,切实把好源头安全关。市政府及食品监管部门要制定相关政策、扶持办法和监管标准等配套制度,通过政策引导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促进第三方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发展,逐步形成政府检验检测机构、社会服务性检验检测机构、企业内部检验检测机构三位一体的食品检验检测技术支撑体系。

4. 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不断增强食品安全监管效能。各级政府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在改革监管体制、调整监管职能的同时,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高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依法行政、依法监管的水平。一要科学合理配置人员编制。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基层一线执法监管上,重点加强区级食品监管部门执法队伍建设,吸纳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切实加强监管执法人员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和处置各类问题的能力,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增强执法效果。二要明晰层级职责重点。按市管决策和结果,区、镇(街道)管执行和过程的要求,科学划分市、区食品监管机构的职责,优化配置执法资源,形成食品监管机构层级清晰、分工明确、运转畅顺、联动有力的新格局。加强统筹协调,适时组织监管力量,

联合开展以农村地区、城郊结合部、餐饮消费密集区为重点区域,以规模小、条件差的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店为重点对象,以群众举报多、反响大的食品为重点品种的专项整治和执法检查,着力解决影响我市食品安全的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小、乱、散和无证经营等违法违规问题。三要坚持管理建设同步推进。深化食品安全示范创建活动,加强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进一步提高示范基地示范效果,以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要实施载体,提高种养殖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加大食品安全示范镇(街道)、示范社区、示范街、示范店和“五小”行业卫生管理示范单位等创建工作力度,按照创建标准和要求,落实创建措施,提高创建质量,进一步扩大全市食品安全创建工作的覆盖面,对已创成的单位,按照巩固提高的要求,落实长效管理措施,完善长效管理制度,加强动态检查和考评,督促其自觉按照食品安全责任承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同时,要在整合相关部门信息资源的基础上,加快推进食品监管信息化体系建设,全面提高食品监管信息化工作水平。

课题组成员:杨建、曹建荣、孔庆国、季春雷、祁丽玲
(责任编辑:陈建萍)

常州市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与比较分析

蔡文静 干晓玉

一、我市经济运行与产业结构情况

（一）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但主要指标在全省位次有所下滑

近年来，常州市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已经形成，全市经济总量和人均 GDP 水平提高较快，GDP 总量年均增长 14.71%，2013 年增长 10.95%，增速高于全省 1.35 个百分点，在全省居第 6 位。2013 年，全市 GDP 总量达 4360.93 亿元，人均达 92994 元，分别为 2009 年的 1.73 倍和 1.63 倍；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拉动明显，2009-2013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长 15.37%，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 14.23%，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长 17%。但与全省和周边城市相比，我市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发展速度相对较慢，部分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排位呈下滑态势。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均从全省第五降为第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第四降为第六，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从第四降为第五，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利税总额均从第六降为第八，消费、出口保持全省第五。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比重从 2009 年的 9.1% 下降到 2013 年的 8.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 7.97% 下降到 7.41%，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比重从 6.7% 下降到 6.2%，此外，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利税总额等占全省比重均略有下降。

（二）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减弱

我市一、二、三次产业比重由 2009 年的 3.6:56.8:39.6 调整为 2013 年的 3.2:51.6:45.2，但 2013 年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3%、38.4% 和 58.6%，产业结构依然呈现“二三一”格局，第一产业相对稳定，第二产业比重逐步降低，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其中，第二产业比重较 2009 年下降了 5.2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了 3.43 个百分点，二产发展速度不断放缓，对我市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减弱，但主导地位较突出，目前仍是拉动我市经济增长的主动动力。第三产业近年来发展明显加快，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稳步提升，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五年平均增长 18.58%，高于二产 6.57 个百分点，2013 年三产占比较 2009 年提升 5.6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也上升 7.76 个百分点。但与先进地区相比，我市服务业发展仍处于偏低的水平，2013 年比重仅略

高于全省 0.5 个百分点，低于南京、无锡 9.18、0.82 个百分点。

（三）工业重点行业分化明显，机械设备制造业主导地位加强

近年来我市制造业规模日益壮大，是我市工业经济的支柱。2013 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 2009 年增加 693.16 亿元，年均增长 21.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2009 年增加 844.95 亿元，年均增长 13.06%。2009 年下半年以来，全市重工业重新加速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轻、重工业比例由 2009 年的 22.19:77.81 调整为 2013 年的 21.01:78.99，表明我市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工业生产逐步向重工业化倾斜，产业适度重型和高级化趋势增强。我市制造业呈现出明显的行业集中性，29 个行业中比重居前六位的行业合计占全部制造业的 67.13%。但重点行业分化明显，传统产业纺织、冶金增速逐步趋缓，2013 年纺织业比重较 2009 年下降 3.1 个百分点，机械行业增幅稳步回升，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比重上升最快，五年间上升了 6.8 个百分点。

2009-2013 年，机械设备制造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上升了 3.55 个百分点，目前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已达到 42.47%，保持我市第一大工业产业的主导地位。值

得关注的是，近几年金属相关工业比重保持较高增长，2013年比重达23.53%，仅比2009年略低1.08个百分点。金属工业比重较高，意味着高耗能产业对单位能源强度的拉升效果明显，这也是前几年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之一。

（四）服务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势头强劲

近几年，我市服务业总体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势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在稳步提升。除住宿餐饮业之外，近五年主要服务业均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年均增速。按照主要服务对象，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随着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势头强劲，在经济和服务业中所占比重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二、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地区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常州与苏南四市、徐州、南通、盐城主要经济指标与产业结构的比较分析，揭示常州经济结构发展与周边地区相比存在的差距。

（一）经济总量比较

2009-2013年，八市GDP总量占全省的82.53%，其中常州GDP比重为7.34%，低于苏州（22.13%）、无锡（13.98%）、南京（12.85%）、南通（8.4%），位列第五位，但从2013年人均GDP来看，常州列八市第四位；增长态势上，常州GDP近五年年均增长14.7%，位列第六位，仅高于苏州（13.88%）、无锡（12.76%），

低于徐州（16.72%）、盐城（16.04%）等地。从五年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利税、利润总额等经济指标来看，常州在八市中总量及增长排位基本位居第五、第六位。2013年常州轻、重工业产值比重为78.99:21.01，重工业产值比重在八市中位居第三，说明我市工业重型化特点比较明显。

（二）三大核心经济变量比较

2009-2013年，常州投资总规模占全省比重8.76%，居八市第五位，苏州、南京、无锡、南通投资规模分别为常州的1.89、1.69、1.37、1.06倍；常州近五年投资平均增速为14.23%，居第六位，徐州、南通平均增速分别高出常州3.21、2.08个百分点。近五年常州工业、服务业投资占全省比重分别为9.26%、8.32%，均居八市第四位，但增势较弱，年均增速分别位居第六、第七位，同期南通、徐州、盐城等地表现出较强的增长动力。从外贸出口来看，近五年常州出口规模占全省比重5.98%，年均增速17.03%，规模与增速分别居第四、第五位，苏州出口规模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占全省的54.51%，无锡、南京分别为常州的2.17、1.61倍，徐州、盐城出口增长最快，分别以34.09%和19.32%的增速位居第一和第二。从消费情况来看，近五年常州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省比重7.75%，居第五位，低于苏州（17.67%）、南京（16.92%）、无锡（13.38%）、南通（9.38%），与第六位的徐州差距为501.4亿元。常州消费年均增速为15.69%，与其他各市差距不大，第一名徐州（16.28%）和第八名无锡（15.45%）也仅相差

0.83个百分点。

（三）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近几年常州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二、三产业比重进一步优化，但与周边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013年，常州三次产业占GDP比重为3.2:51.6:45.2，二、三产比重分别高于全省2.4、0.5个百分点。2009-2013年，常州二产总量9415.81亿元，占全省比重7.76%，居第五位，低于苏州（23.98%）、无锡（14.82%）、南京（11.24%）、南通（8.88%），略高于徐州（7.09%）；二产年均增长12.01%，居第六位，仅高于苏州（10.79%）、无锡（10.36%）。与二产情况类似，常州三产总量7492.99亿元，占全省比重7.39%，年均增长18.55%，规模及增速分别位居第五、第六位。

三、存在问题

（一）三次产业存在结构偏离，产业内部结构失衡

我市工业结构不尽合理，工业重型化特点明显。重工业比重一直维持在75%以上，工业发展对重工业的依赖较大，缺乏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新型技术行业，以生物技术、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产业结构转型压力较大。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突出表现在房地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以金融、物流、信息传输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生产性服务业不发达，服务业仍处于低层次结构水平，增长主要还是依靠传统服务业。

（二）经济贡献与税收贡献不协调

工业结构不合理、产品初级化、能源高消耗，使得我市经济

增长质量不高，体现在税收上，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匹配。从三大产业总量占比排序来看，GDP产业构成是“二三一”，公共财政预算税收产业构成是“三二一”。三产在GDP中占比不足50%，却贡献了过半的税源，说明三产的税收贡献高于经济贡献。二产经济增长与税收关系比较稳定，但对GDP及地方税收的贡献率整体呈下降趋势，说明第二、三产业发展与其税收贡献并不同步。因此，低比重、高增长、高贡献的第三产业与高比重、低增长、低贡献的第二产业之间存在着必须解决的一个结构性矛盾。

四、几点建议

（一）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我市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扎实推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落脚点放到增强财政实力上来。通过优化第一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壮大第三产业，坚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推动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格局。

（二）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加快工业转型升级

工业是财源建设的主体，要把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放在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上，围绕“十大产业链”建设和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双百”行动计划，着力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做大做强优势产业，通过优势产业发展带动工业经济转型发展，提高工业经济发展整体质量。特别是要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发展，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等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形成更具竞争力、更具优势的主导产业。

（三）推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促进企业主辅分离

现代服务业是以金融保险、信息服务、旅游、物流等为代表的新兴第三产业，与传统服务业相比，现代服务业更突出了高科技知识与技术密集的特点。应当在巩固发展旅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鼓励重点、成长型服务企业做强做大，争取在金融、电子商务和文化创意等行业引进一批知名度高、经济效益好的大项目，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加快形成现代服务业的高端化体系，从而提高税收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同时，及时梳理和完善现有政策，探索有效奖励配套措施，切实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工作，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突破口和结构优化、产业升级的重中之重。鼓励企业将生产性服务业外包，优化产业分工和相互协作，推动三次产业融合。

（四）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为产业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中小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

是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加快培育一大批成长型中小企业和科技型初创企业，对于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形成“龙头带动，众星拱月”的企业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产业升级，增强企业竞争力，加大产业集群培育力度，财政各类扶持资金向重点产业集群的骨干企业倾斜。二是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支持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三是创新金融支持方式，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通过财政资金担保、建立小企业贷款奖励和风险补偿机制、简化融资担保手续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力度，加快推进政银合作创新。

（五）优化科技投入，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要优化科技经费投入机制，把科技经费投入着力点转到以企业经济效益为导向的产业项目上，鼓励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牵头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要提高财政资金扶持集中度，整合科技、人才等专项资金，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社会公益技术、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投入，把科技经费重点投入到能迅速形成经济效益的科技创新项目中，并加强对项目资金分配、使用和绩效的监督，营造公开透明的科技投入环境。

作者单位：常州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耿丽珍）

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经济运行浅析

李建新 刘光俊 肖新民

据统计,2014年度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或交易额)595亿元、利税10.6亿元和带动农户140万户,分别比上年增长10.9%、5%和6%。总体上,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全年经济运行呈现“稳中质提”新态势,主要表现在:

一是龙头企业的结构布局进一步优化,加工为主型龙头企业的占比和带动农产品加工转化的能力提升。2014年市级层次的农业龙头企业实现了调整与发展,使加工为主型龙头企业成为了主体,现有市级以上加工为主型龙头企业达77家,占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的81.9%,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加工为主型龙头企业实现年销售129亿元,比上年增长14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年销售超亿元的加工为主型龙头企业27家,比上年增加2家。

二是龙头企业的带农惠农能力有提高,自建基地的龙头企业占比和合作合股方式带动农户的数量提升。目前市级以上龙头企业中有自建基地的企业达65家,占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的69%,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目前市级以上龙头企业有自建种植基地15.8万亩,比上年增加

5万亩。目前市级以上龙头企业通过合作合股方式带动农户数达36.2万户,比上年增加0.58万户。

三是龙头企业的运行质量尤其是抗风险能力有提高,“五个一”示范企业的占比和自建冷链设施的企业数量提升。目前有47家农业龙头企业建成为“五个一”示范企业,占县级以上龙头企业的12%,比上年提高3.1个百分点。同时,通过冷链设施的建设,有效提高了企业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抗风险能力。目前在市级以上龙头企业中,有自建冷链设施的企业达30家,其中能实施冷运供应的企业有16家,分别比上年增加10家和4家。

2014年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之所以能实现“稳中质提”,主要得益于“六个一”工作举措:

一是培育了一批“国字号”典范。2014年新增了2个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累计6个;新增了1家国家级主食加工示范企业,累计2家;新增1个国家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合作社。另外,3个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顺利通过两年一次的严格监测关。

二是发展了一批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按照年初政府工作重点

要求,对现有25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进行严格监测,淘汰了2家,同时,按照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申报条件,经过专家考察和评审,新发展了34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三是组织了一次全面性企业培训。用了两个月时间的精心筹备,对全市94家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和财会人员近200人,进行了为期2天的政策和业务培训,市农委主任和省农委农业产业化处负责人亲自授课,受训人员反响很好。通过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农业龙头企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四是新上了一批农业产业化发展项目。在2014年面临新的大环境、大形势下,农业产业化条线上下共同努力,总体上,项目推进发展工作平稳增长。市级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顺利落实了23个项目,扶持资金800万元;向省级申报农业产业化发展引导资金,实施了9个项目,扶持资金1600余万元。

五是搭建了一个企业融资服务平台。针对农业龙头企业融资难,与江南银行协商合作,签署了《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合作协议》,由江南银行采取“信贷

扶持、利率优惠”的方式支持农业龙头企业贷款。已组织推荐了7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落实优惠贷款2亿元左右,使农业龙头企业贷款减少10%左右的利息支出。

六是新创了一批“五个一”示范企业。按照“十二五”期间农业龙头企业“五个一”示范建设目标和年度工作目标,2014年有20余家企业积极开展“五个一”示范建设,新创建“五个一”示范农业龙头企业13家。

2015年全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工作重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组织开展“一项提升行动”——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行动。按照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组织开展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行动,重点突出提升农产品加工能力,拉长农产品加工业“短腿”。深入调查,认真研究,制定一个《提升全市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行动方案》,重点从提升主食加工、农产品加工型龙头企业、特色农林产业和特色农产品加工集中区等方面,促进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再上新台阶。

2. 继续开展“二类示范创建”——“五个一”示范龙头企业和“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按照2015年市委一号文件精神要求,

认真组织开展“五个一”示范龙头企业和“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建设,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向“一村一品”专业村渗透,专业村向农业龙头企业靠拢,推动“一村一品”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双赢。全年争创“五个一”示范农业龙头企业10家、“一村一品”示范村镇10个。

3. 突出抓好“三大政策扶持”——项目扶持、金融扶持和担保奖励。一是按照农业项目管理新要求,突出搞好项目绩效目标全程管理和贴息项目储备库管理,积极探索项目立项、实施、监督“三权分离”。2015年争取实施25个以上省、市农业产业化项目,带动新增投(融)资超2亿元。二是与江南银行合作争取利息优惠的农业龙头企业银行贷款超2亿元,并与中国银行合作探索纯信用贷款方式,试点农业龙头企业“保证保险”贷款。三是切实落实兑现好农业信贷担保“以奖代补”政策。

4. 努力搭建“四个方面平台”——农产品加工企业集聚、龙头企业培训交流、龙头企业融资和名优农产品展示(销)。一是按照省级农产品集中加工区创建的“六有”条件,组织有基础的辖市区,借鉴“金西”或其它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的建设模式,

主动搞好自测自评,努力创造条件,加大农产品集中加工区培育力度。二是建立健全农业龙头企业培训交流制度,每1-2年组织开展一次农业龙头企业培训,架起龙头企业与政府部门、与金融部门、与龙头企业之间交流的平台。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参加省级以上开展的各类培训,架起龙头企业到各大名校学习交流的通道。三是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参加各类农洽会、农展会,开展对外招商、扩大引资。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参加省级有关招商活动与推介知识培训。进一步完善常州农业龙头企业网站平台,推介龙头企业、“一村一品”村镇的特色农产品和名优农产品,充分发挥网站交流龙头企业信息和宣传龙头企业的对外“窗口作用”。四是继续搞好农业龙头企业融资服务平台。按照与江南银行、中国银行达成的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合作性协议,搞好农业龙头企业融资服务平台搭建,创新“政、银、企”合作方式和金融服务方式,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切实缓解农业龙头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融资难(贵)的现实问题。

作者单位:常州市农委
(责任编辑:罗志平)

“走出去”企业国际化重构的税收风险及应对

俞晟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动，促使企业调整发展战略，中国企业通过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企业重构，谋求市场的拓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以获取经济资源，争取技术来源，突破贸易保护壁垒，实现持续发展。作为省内乃至国内重要的民营企业聚集地，常州“走出去”现象尤为突出。

一、基于驱动因素的税收风险分析

不同的企业“走出去”是基于不同的驱动因素。驱动因素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跨国交易架构搭建、交易方式、交易内容产生影响，由此也产生不同的经济和税收风险。

（一）供应链重构型税收风险

从我市企业对外投资的情况来看，供应链重构是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目的之一，其中又可以分为三类。1. 投资矿产资源，拓展供应链上游。如以常发为代表的企业，投资目的地多为矿产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企业通过拓展供应链条，拓宽原料供应渠道，破解国内原材料供应与生产的矛盾，更多的占有价值链份额。从行业所属的类型上看，这部分

以占有投资国原材料为目的的企业多集中在机器零部件、电子零部件等行业，投资集中在铜、铁、煤矿等矿产资源。2. 降低成本，生产基地转移出境。国内越来越高的用工成本促使“全球工厂”的定位悄然发生变化，企业逐步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家流动。以东奥服装等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将走出国门的投资目的地放在了东南亚地区，国内骨干员工作为管理人员派驻境外企业进行指导。3. 提升市场份额，完善销售网络。对渠道的控制就是对市场的控制，国际竞争力更多地开始表现为渠道的竞争。拓展自身的境外营销活动，构筑一个高效、灵活、开放的国际营销网络，成为我市企业不得不面对的迫切问题，向境外拓展营销、服务网络成为做大做强战略性抉择，天合光能的海外布局就体现了这一因素的影响。

供应链重构的企业其税收风险主要体现在购销交易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投资利润长期堆积在境外不分回、无形资产收益应收未收等方面。

（二）价值链重整型税收风险

单一通过提高工业产出和生产产力难以实现企业的发展，因此

必须在卓越运营上与国际水平接轨。根据自己所在行业的竞争特点向上游拓展，大力投入创新和产品开发，或者向下游拓展，从而获得价值链上更多的份额，向外拓展是一个重要方向。通过直接投资、并购等方式实现价值链整合，企业可以获得价值链高端研发环节的技术和知识，还可投资于营销渠道以控制商业运营环节，同时配置生产制造环节，最终实现节约成本或接近市场的目的。金昇实业的海外并购就是这类企业的代表。

价值链重构的企业税收风险主要为虚构技术转让、支付技术使用费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价值链环节的功能风险错配等。

（三）资金融通型税收风险

国内资金成本高、资本市场限制较多、外汇管制等因素促使企业“走出去”借助国外资本市场的资金，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本外币市场差异，通过上市、发行债券、贷款等方式，为企业供应链的延伸进行资金资源的整合。通过不同的产品安排整合不同市场的资金优势，进行资金周转配置调度，提升自身的经营能力，实现效益最大化。通过投资与融资的内部化，实现财务上的互补，提高资金利用率，从而达到降低资金成本和债务风险的目的。

这类企业典型的税收风险是：在通过金融工具的多途径使用实现境外关联公司融资目的时，不但利用各国税制差异从整体上实现税负最低，同时也实现了列支利息或手续费侵蚀国内所得税税基、变相提前分配利润的事实。

（四）破解贸易壁垒型税收风险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与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摩擦层出不穷，技术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反倾销等措施，极大的限制了我国企业的发展。为了突破贸易壁垒，纺织服装、电子、光伏等行业纷纷走出国门设厂，通过新建或者企业重购等方式，将国内的生产工厂转移到目标市场所在国或其他不受壁垒影响的区域，从而消除贸易壁垒的影响，帮助企业有效进入并打开市场、发展壮大。

此类企业可能的风险与供应链重整企业的税收风险较为类似。

（五）避税型税收风险

通过搭建离岸架构，在避税地设立公司，将企业的利润通过特许权使用费、购销业务堆积在避税地，从而逃避国内的税收管辖，实现避税目的。出于这一目的对外投资逐渐呈上升趋势，在经营、管理与国际接轨的同时，避税思想也同步接轨。

这类企业通常存在交易形式合规但缺乏明显的合理商业理由、境外直接交易方往往无实质经营业务、交易合同缺乏对应的风险和回报条款、涉及低税率国家（地区）、部分交易资金跨循环流转等特征，是“走出去”企业中税收风险较为集中的一类企业，严重侵蚀我国税基。

二、按税收风险端口分

析

（一）政策端——财务、税收政策未相应配套导致遵从风险

1. 境内外不同会计核算体系导致税收风险。从我市“走出去”企业的目的地来看，主要适用的包含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虽然我国会计准则经过历次修订后与两大会计准则有趋同的趋势，但是仍有很多的不同点。企业为了统一核算，特别是境外上市的公司，其境内公司在适用会计准则时使用境外会计准则，核算上的差异有可能对利润和税收事项产生税收风险。

2. 跨国并购重组税收政策的适用的风险。跨境并购重组主要涉及的文件是财税（2009）59号文件，是否符合特殊重组规定、并购股权作价等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企业在适用政策时往往忽视相关前置条件，导致税收不遵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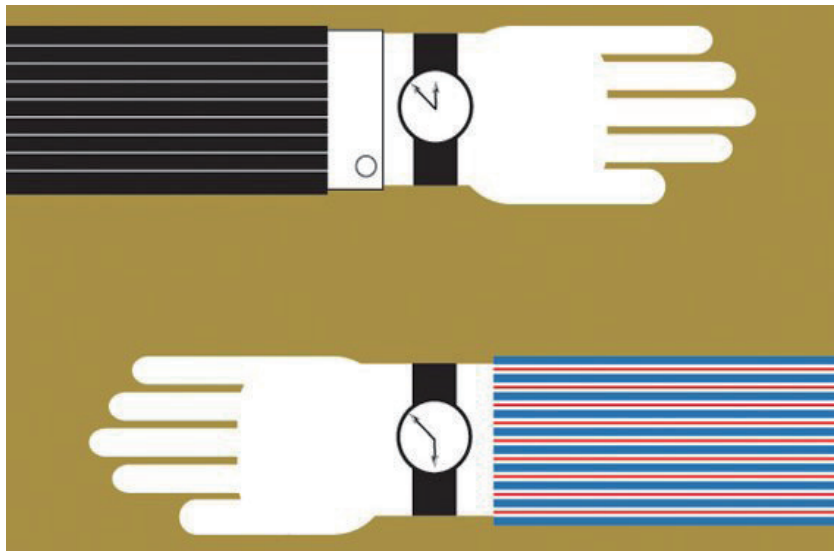
3. 税收政策空白的遵从风险。如股权激励税收政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18号公告《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公告》相

关规定，居民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其所发生的支出，应属于企业职工工资薪金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税法）第八条规定，此费用应属于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支出，应当准予在税前扣除。但是此文件仅规范了居民企业，包括在境内的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这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企业“走出去”是在境外采用的红筹上市模式，企业实际在境外上市的公司是在涉外设立的“特别目的实体”（SPV）。但员工是在境内企业工作，股权激励采用的股票是SPV的股票，这里就存在集团间股权激励的所得税扣除问题。另外，目前仅有针对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税收政策，但没有直接规定股票增值权的税务处理办法。从18号公告颁布至今已近两年看，前期发放的股权激励基本已到行权期境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问题如何解决悬而未决，对企业而言是一项巨大风险。

（二）业务营运端——功能错配导致转移利润风险

1. 通过企业重构，“走出去”

（下转第36页）



致力机关道德教育的调查与思考

李沛然

推进机关道德教育，是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机关道德教育作为创新型培植课题，我们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针对存在问题，深刻剖析原因，探讨对策措施，并结合本级机关实际，对加强机关道德教育作了一些理性思考。

一、存在问题

实际工作中，各级机关仍存在着“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等现象，暴露出了机关思想道德教育不到位的内因。具体表现在：

（一）务虚不务实。应该说，大多数单位能够重视抓好机关道德教育工作，利用各种场合积极开展各类教育活动。但也有部分单位“重于要面子、好于假大空”，道德教育针对性不强、实用性不佳，使得少数干部心态发生异化，理想信念淡化；心生攀比心理，丢弃勤俭朴素等。归根结蒂，还是因为教育没有处理好“务虚”与“务实”的关系，在“学与用”上存有脱节现象，致使道德教育局限于表面，没有真正入脑、入心、入行，没有带入工作中，没有体现在行动上。

（二）管事不管人。很大程度上，有的单位满足于做好日常的事务性工作，而忽视做好人的思想工作；还有的单位热衷于经济民生的指标性工作，而不把工作人员的道德教育当回事，致使少数干部徘徊在道德教育边缘，或是游离于道德教育之外，久而久之就养成了爱做表面文章，工作作风飘浮，乐于急功近利等思想，暴露出机关道德教育“管事不管人、以人不为本”等现象。

（三）求有不求精。有的单

位抓道德教育，只是倾向于“过场”，而不在于受教育对象的接受程度；有的只是满足于完成程序任务，而不苟求于作用效果，存在着“重计划、轻落实，重形式、轻内容，重整体、轻个体”等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机关道德教育量身定做不够，定位切入不准，教育设置不精，缺乏针对性、可行性和实效性。

二、原因分析

通过分析认为，机关道德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在四个层面：

（一）在思想认识上重视不够。少数单位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把机关道德教育摆上工作日程，想抓就抓，不想抓就不抓，教育的随意性过大；没有把机关道德教育放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里思考，嘴上天天喊科学发展观，事实上总是“对事不对人”。特别是个别领导干部重视经济效益，不注重人本理念，对抓好道德教育认识不足、领导不力。

（二）在内容形式上结合不紧密。有的单位抓道德教育时，与机关工作的特点规律结合不紧，教育方式不能契合时代要求，教育重点不能紧跟形势发展，教育内容不能迎合职业需求，暴露了道德教育的局限性；与机关从业人员的真实思想结合不紧，没有弄清楚他们“想什么、需要什么”，没有因人而宜、因事而宜，造成了道德教育的盲目性。

（三）在学以致用上转化不深入。一方面，职能部门在组织道德教育理论学习、制定教育计划方案时，没有把理论学习与认真践行统一起来，没有突出教育实践环境考验，没有体现工

作实践和生活实践。另一方面，组织开展道德教育主题活动时，没有以人性为逻辑起点，从人的需求出发，道德教育形式单一，内容脱离实际，在学以致用转化上不深入，没有凸显教育的经常化、长效化、日常化，导致道德教育实际效果欠佳。

（四）在长效管理上制度不完善。缺乏严谨的考核、激励等机制，抓得好与抓得不好一个样，学得好与学得不好一个样，做得好与做得不好一个样；缺乏有效的监督、自查等机制，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行为中，没有构建约束管制的有效网络，没有形成保障有力的制度支撑。

三、建议对策

抓好机关道德教育，起点在组织领导，重点要以人为本，落脚点是实践锻炼。就当前机关道德教育的现状来看，应着重把握好“五个度”：

（一）在思想认知上要提升高度。加强机关道德教育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要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机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和紧迫性，把机关道德教育放在突出位置来抓，大张旗鼓地倡导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贯穿于各种具体道德规范之中，提升机关人员的道德素养和精神内涵，为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发挥模范作用。要从发展的高度，紧密结合机关工作实际和特点，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依据，加强机关道德教育的顶层设计，研究制定教育意见和具体措施，

努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机关道德体系，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风气，为促进和谐机关建设、推动文明社会发展打下强有力的思想道德基础。

（二）在内容拓展上要加大力度。新的历史条件下，应从公民道德建设入手，加大机关道德教育力度。一方面，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最大程度上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所有人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要坚持义不容辞的责任，以机关文化建设为突破口，结合各自的工作职能，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大力宣传基本道德知识、道德规范和必要礼仪，积极开发优秀民族道德教育资源，利用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最大可能地充实富有时代特色的机关道德教育内容，推广机关干部易于接受的各种教育方式。

（三）在道德实践上要拓展广度。机关要从工作实际出发，有计划、有重点地抓好道德教育，突出“一个重点、两个定位”：“一个重点”，就是要突出职业道德这一重要内容，帮助从业人员熟悉和了解与本职工作相关的道德规范，把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作为考核、奖惩的重要指标，培养敬业精神，树立行业新风，促使从业人员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两个定位”，就是要秉承“生活化和工作化”这一定位，突出“以人为本”这一核心，探索道德“工

作化”，把职业道德融入岗位实践，在平凡的工作中体现“德”的内涵，让道德教育植根于8小时以内的工作圈；推广道德“生活化”，把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融入机关道德教育实践，提升个人品德，让道德教育吸附于8小时以外的生活圈，实现道德教育全天候、全覆盖、全过程，构建机关道德教育生态。

（四）在教育创新上要挖掘深度。机关道德建设的过程，是循序渐进、不断推进的过程。当前形势下，机关道德教育要不断地挖掘深度，在“四个结合”上作出探索：一要坚持把机关道德教育与机关“道德讲堂”主阵地深密嵌合，在学习互动中不断创新教育模式，丰富教育内涵，凸显勤于实践、敢于创新的勇气和信心；二要坚持把机关道德教育与群众路线实践、“百千万”帮扶工程、“三解三促”领导下基层等深入结合，让机关道德教育延伸到田间地头，走进“帮扶村”；三要坚持把机关道德教育与文明创建、“书香工程”、义工志愿服务、城市精神践行等深度融合，力争达到全系统100%覆盖、100%参与，主动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四要坚持把机关道德教育与同行学习走动、城市文明互动等深层粘合，在“请进来、走出去”中宣传、辐射、碰撞、交融、生存，共同推进机关道德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使广大机关干部职工在自觉参与中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

（五）在常态管理上要完善制度。机关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应着力“两

手抓”：一手抓道德教育评价机制。要依据《国家公务员法》及有关规定，从建立测评指标、典型示范、奖惩结合、民主评议、激励考核入手，对机关人员进行定期的道德考核和评价；对在道德方面有突出贡献和成绩显著的机关人员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并做积极的正面宣传；对因为道德造成失职渎职、玩忽职守、违规违纪的行为和个人依法进行严肃处理；要将道德考核与奖惩直接挂钩，把考核内容与奖惩等次对应起来，

并与升降留转结合起来。一手抓道德教育监督机制。要充分发挥机构、社会、举报的监督作用，不断推进党务政务公开，引导媒体有效监督，强化“敢、愿、能、想”的主动性监督意识；要积极构建体自下而上、体制内外的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网络，及时发现和掌握机关人员的思想道德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查找和纠正机关诚信建设方面存在的盲点和薄弱环节，形成道德监督强大合力，增强道德教育实际效果。

加强机关道德教育，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尤其是各级党员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自觉把道德教育融入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遵守廉洁从政，接受道德监督，用良好的道德形象取信于民，为促进机关道德、作风和效能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责任编辑：罗志平)

(上接第 33 页)

企业实现了业务、组织、财务等方面的重新调整，跨国重构后企业的供应链实现了整合与升级，对管理与决策、生产与贸易、研发与技术等要素在集团内跨地区重组，但当企业职能发生变化时，未从经济实质角度对职能和风险承担者的利润水平重新定位，导致企业职能定位、经济实质与利润水平不相匹配或者没有获得相应补偿，致使我国税基受到侵蚀。

2. 企业有意识的利用国内外公司的利率差异、税率差异，通过融通资金的方式将利润转移至境外

3. 通过在避税地或低税率地区设立公司，将研发、营销等活动定位在这些公司，将利润向低税率或避税地转移。

4. 设立受控外国公司，有意识控制受控外国公司的利润，少申报或不申报利润，导致我国税基侵蚀。

不管是我国税务机关还是境外税务机关，都将会对企业行为是否侵蚀本国税基予以关注。跨境重构中，如何协调好各个纳税

主体的利润水平，使其与真实的功能风险相匹配是企业“走出去”时需要在设置整体架构时予以充分考虑。

(三) 资本营运端——境外上市后被收购或反收购导致的税收风险

如我市康辉、创生两户企业，境外上市后使得公司在资本市场受到极大关注，从而被境外竞争对手实施收购，由此带来收购过程中对投资者征税的风险。企业上市前对其组织架构进行筹划，如通过设置信托、转变国籍等安排，以达到避税的目的，因此而与税务当局发生税收争议。

三、加强“走出去”企业税收风险监管的应对策略

(一) 加强专业化税收监管。通过建立高素质反避税专业队伍，搭建国际税收信息化网络，建立与财政、外事和公安等政府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依法治税、专业监管和风险防控。

(二) 健全税收法律法规。应制定“走出去”企业税收征收

管理规程，完善相关政策空白，如境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税收政策；完善受控外国公司的监管体系，如完善境外所得申报、抵免、优惠体系，提高操作性；充分研究有利于分享海外企业利益的政策措施，在跨境纳税人身份判定、合并纳税以及特别纳税调整方面，加快立法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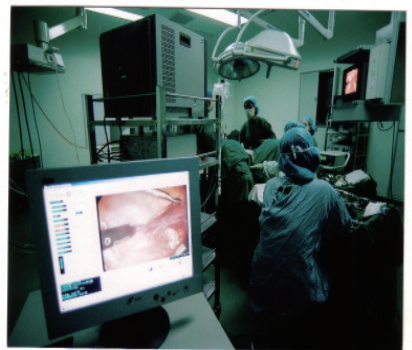
(三) 优化税收政策规定。主动了解企业的税收需求，扩大协定谈签范围，简化政策执行难度，增强税收政策的可操作性和执行性，提升“走出去”企业的税法遵从度。

(四) 深入开展前瞻领域研究。金融工具的使用、境外投资形式的多样性和隐蔽性，促使税务部门加深对相关前瞻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自贸区金融安排推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的情况下，金融创新对税收的挑战越来越突显，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分析、跟进变化和变动，已迫在眉睫。

作者单位：常州国税局第四分局
(责任编辑：陈雅娟)

的思考 构筑新时期卫生计生人才优势

王莉



坚持人才强卫战略，更高层次地集聚优秀人才，更大力度地引进培养人才，努力实现各类人才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建功立业，实现在科学技术密集的卫生计生行业的“倍数效应”。

卫生计生行业要努力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推动医学科学发展的创新能力，在复杂疑难疾病的救治、重大疾病的预防控制、中医药的继承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并具有一定知名度的高层次卫生人才，使高层次卫生人才数量有较大增长，人才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

1 创新工作机制，激发人才活力

灵活有效的工作机制是盘活人才资源，构筑人才高峰的关键。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努力形成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更加开放的人才管理机制，为人才工作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1.1 完善选拔引进机制。一方面建立和健全以业绩为核心，以品德、知识、能力、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公开选拔、招考、招聘等多种途径选拔各类人才，另一方面，按照不求所在、但求所用，不求所有、但求有为和人才资源共享的理念，通过技术合作、项目交流，或采取聘任兼职、短期技术顾问、名誉教授和专业导师等形式，柔性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专业人才，指导、帮助开展科学研究

和技术开发。

1.2 完善培训支持机制。围绕省“双创计划”、“333 高层次人才工程”等人才项目的申报以及重点学科、专科的建设，充分利用卫生和社会教育资源，积极落实好各类培训规划，切实加大各类人才的教育培训力度。加强与国内知名大学和医学院校开展合作，优先安排高层次人才外出考察、进修、学习，支持参加各类学术和技术交流活动。充分利用培训基地，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不断更新知识，提高创新能力。

1.3 完善激励保障机制。坚持物质激励与成就激励、精神激励相结合，进一步健全完善与工作岗位相适应、与工作业绩相联系、有利于人才创新创造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真正使分配向关键岗位、关键人才倾斜。对成绩突出特别是取得科研技术重大突破的，予以重奖。对高层次高技能和紧缺人才，可以探索年薪制、协议工资、项目工资制等多种分配方式，不断激发优秀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 创优服务举措，促进人才成长

服务是人才开发利用的基础与保障。以人才全面发展的需求为导向，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新途径、新方法，努力做好各项人才服务工作。

2.1 注重平台建设。一方面积极搭建与知名医疗机构和医学

院校的合作平台、与生物医药产业链对接平台，加速新技术引进和成果的转化，为各类人才提供创新创业的平台。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快医学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学科、重点专科的建设，不断改善科研、教学和工作条件，为各类人才提供发挥作用的舞台。医学会、医院管理学会等各种专业学术团体，要开展多种形式的专业活动，努力为人才的学术交流提供平台。

2.2 注重支持关爱。对各类人才在专业技术上要精心培育，在工作生活上要真情关怀，切实解决好人才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他们大展身手，大展宏图。各职能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改进作风，既要为各类人才开展科研教学搞好服务，又要加强对人才项目的管理，按照“大干大支持、快干快支持”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优化项目考核和资金拨付机制，确保财政资金有效使用。

2.3 注重宏观规划。要定期分析本单位人才队伍状况，根据单位的发展定位和目标确定人才队伍的规模、结构及重点发展的方向，以重点学科、重点专科建设作为突破口，率先实现突破，带动其他学科的发展。每个重点

学科拿出三到五年人才引进和培养的计划，有针对性、有计划地进行发展。对急需引进的高层次、紧缺专业的成熟型人才，用人单位可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申报，按规定程序通过考核招录。

3 营造良好环境，优化发展氛围

良好的发展环境，对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能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要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提供广阔舞台。

3.1 加强组织领导。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是卫生计生改革发展的关键期、攻坚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对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更为迫切。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牢固树立抓第一要务先抓第一资源，抓第一资源先抓一把手的理念，通过编制人才规划、制定人才政策、设立人才项目，把人才优先开发落到实处。要认真对照高层次卫生人才引进、培养工作意见，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任务，研究制定具体的落实举措，并实施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把人才工作作为各单位领导班子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以责任制促落实，出成效。

3.2 加大经费投入。人才投资是效益最优、潜力最大的战略

性投资，是人力资本加快积累、战略提升，形成优势的源泉。要坚持人才优先投入，科学解决人才投入中“愿投、敢投、会投”等问题，不断加大对人才培养引进，以及重点学科、专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投入。要根据人才培养引进的规律和实际情况，设立专项经费，对引进的各类人才进行配套奖励资助。要强化绩效观念，定期对人才投入进行专项审计，对重点人才工程进行绩效评估，提升人才考核的准确性、科学性。

3.3 广泛宣传引导。大力宣传卫生人才工作的政策措施，努力营造尊重人才见贤思齐、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使用人才各尽其能的良好氛围，让卫生计生各类人才活力竞相迸发。完善人才荣誉制度，大力表彰奖励优秀人才。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加强卫生人才工作，特别是学科带头人、重点培养对象等在科学研究、成才成长等方面取得成绩和先进事迹的宣传，不断扩大社会影响，提高知名度，充分展示各类人才的形象和风采，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

作者单位：常州市卫计委
(责任编辑：陈满林)

社情民意调查工作的思考

余峰

“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得民心，先要听民意，查民情，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调查渠道”，党的十七大要求“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社情民意调查需要不断地改进完善。

一、社情民意调查发展的现状

1. 社情民意调查机构初步健全。随着社情民意调查需求的日益高涨，有关部门积极拓展服务领域，不断强化社情民意调查职能，大力充实社情民意调查力量，整合相关资源组建社情民意调查机构。目前，全国大部分省级统计部门专门成立了社情民意调查机构，部分省、区的社情民意调查机构已经延伸覆盖到地级市统计部门，社情民意调查机构网络初步健全。党委宣传部门、新闻媒体、高校科研机构等也成立了相应的社情民意调查机构，民营甚至外资民调机构得到一定的发展空间并尝试涉足社情民意调查

项目。

2. 社情民意调查项目蓬勃发展。各地各级社情民意调查机构服务决策、服务基层、服务民生，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及时关注人民群众对当前社会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的看法，组织实施各类社情民意调查项目，不断丰富社情民意调查内容，努力拓展社情民意调查范围，社情民意调查已涉及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的评价、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对行风建设的评议、对国内国际事务的态度、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看法等诸多领域，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

3. 社情民意调查方式不断丰富。社情民意调查机构传统的调查方式是入户访问和现场拦截等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网络调查方式不断推行，国际上流行的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系统得以全面采用。和其他调查方式相比，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CATI)具有调查范围广、访问效率高、过程不扰民、

全程监控严、数据真实度高、统计分析准、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是一种快速、高效、高科技的社会调查手段，获得的调查数据更能反映客观实际。另外，全国统一的12340社情民意电话调查热线号码投入使用，作为的公益性服务号码，能够提高电话调查接线率和接访率，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为社情民意调查工作提供了强大武器。

4. 社会效果日益显现。多年的实践证明，社情民意调查为社



会大众表达意愿提供载体，为政府决策倾听民意拓展渠道，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架起了双向交流、互动沟通的桥梁。社情民意调查机构开展相应专项社情民意调查工作，及时将原始调查数据进行分类汇总、分析整理、加工提炼，形成了许多参考价值较高、针对性较强的成果，为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民主决策、科学管理提供了客观性数据资料和针对性的信息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社情民意调查面临的困境

社情民意调查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尚处在起步阶段，仍然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在：

1. 职能界定不清。第一，政府垄断性。目前，由于体制障碍以及意识形态管制等种种原因，社情民意调查基本处于政府垄断状况。虽然政府在社情民意调查方面，没有给民间调查机构下达明确的禁令，但民间调查机构一般不会主动涉足，尤其是对于一些敏感领域，更是被民间调查机构视为禁区。第二，监管内部性。由于社情民意调查基本由官方调查机构垄断，政府有关部门对其所属的社情民意调查机构是系统内部行政命令式的监管，社情民意调查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缺乏独立性和中立性。第三，职能的模糊性。就民意调查工作职能在党政部门的内部配置而言，尚未明确。目前，统计部门的社情民意调查机构网络相对比较健全，具有先占优势，但也有部分官方社情民意调查机构由宣传等部门管理，民间调查机构基本处于自律状态，长期游

离在政府监管范围之外。

2. 社会认可不高。毋庸讳言，政府公信力下降导致了一定的信任危机，老百姓不信任政府，变成了‘老不信’，这在官方统计调查领域也得以体现。官方统计调查数据频频遭到网民质疑，还催生出“被增长”、“被满意”等网络热词。网络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足以表明，整个社会对官方统计调查数据的认可度不高，在此背景下，官方社情民意调查数据也难以幸免。如某官方民调机构的一项民调结果通过网络发布后，网民通过网络开展的自发调查结果竟然于其完全相反。民间调查机构的调查数据，由于受利益驱动、道德风险、质量控制等种种原因，也难以得到社会认同。

3. 法律制度不全。据了解，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社情民意调查的独立机构——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成立于1988年，第一家统计系统的社情民意调查机构——北京市民意调查中心成立于2003年。但笔者初步检索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查询到有关社情民意调查的只言片语。社情民意调查的职责，来源于有关“三定”方案的具体规定。但“三定”方案只是党政机关内部的红头文件，其本身不具有法律、法规的效力。社情民意调查的立法尚属空白，相关的制度建设基础非常薄弱，制度规范很不健全。

三、完善社情民意调查的对策措施

对于社情民意调查工作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抓住以下主要方面，全面深化改革，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改进完善：

1. 厘清监管职能。第一，去行政化。目前的社情民意调查过于行政化和高度垄断化，必须要下大力气予以改革，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把社会的还给社会。政府应该大力培育发展民间调查机构，社情民意调查的资源配置，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引进民间调查机构，营造条件准入、机会均等的市场环境，形成良性竞争。第二，强化监管。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社情民意调查去行政化并不是说要政府放任不管，而是要加强有效监管。“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社情民意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对于社情民意调查阵地，政府必须加强有效监管，其责任更多的是对调查机构和调查活动进行监督与规范，确保其在健康、法治的轨道上发展和运行，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凝聚社会正能量。第三，明确监管部门。对于社情民意工作职责，一贯由党委宣传部门主管；对于调查工作职责，公安机关掌握更多的资源；对于统计调查工作职责，统计部门更具优势。目前统计部门已经抢占先机，大力开展社情民意调查工作。撇开部门利益和门户之见，不在于由哪个部门作为社情民意调查主管部门，而是要尽快明确主管部门，这样才能实施有效监管，防止监管趋利，造成多头监管和监管空白。

2. 提高公信力。要提高社情民意调查机构的公信力，消除民众的质疑，关键在于保障社情民意调查结果的客观真实性。主要从两方面入手：第一，保持适当

(下转第47页)

人民调解发展过程中亟需回答的四个问题

高玉华 上官正国 许海军

社会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一些基础认识仍然混乱不清、各持己议，如果不在人民调解的价值、功能、定位等根本问题上统一思想，就有可能导致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混乱。本文即试图从四个方面一一阐述人民调解工作的本质，希望能为人民调解的顶层设计提供粗浅参考。

一、人民调解是解决社会冲突不可或缺的根基

少数人受西方司法观念影响较深，过度放大法律在社会冲突中的调剂消弭功能，认为只有法院的依法裁决才能精准地厘断是非，最大程度体现民事纠纷的权责对等。为此，社会上始终存在着对人民调解的轻视看待，认为调解无法准确地判别对错，一定程度上甚至阻碍了法治精神在公民社会的培育发展。

实际上，在我国司法资源极端紧张的现状下，尤其是考虑到诉讼资源的供需矛盾仍将持续计划，诉讼这一解决冲突的最佳模式离不开人民调解的扶持帮助。下表仅以 2013 年为例：

	全国	江苏省	常州市
法院受理	1423	124	8.4
人民调解受理	940	48	1.7
人民调解占比	66.1%	38.7%	20.2%

2013 年，全国、江苏省、

常州市的法院分别受理案件 1423 万件、124 万件、8.4 万件，同期全国、全省、全市的人民调解系统分别受理案件 940 万件、48 万件、1.7 万件，人民调解与法院受理的三级占比分别达到了 66.1%、38.7%、20.2%。然而，就在人民调解已经极大减轻法院系统负担压力的情况下，2010 年至 2013 年全省仍有 988 名法官不堪重负离开法院，占到了全省法院法官总数的十分之一。全省法院受理案件总数与一线法官人数之比已达 171.1:1，基层法院更达 205.82:1，平均每位法官不到 2 天就要审结 1 起案件。没有人民调解，一些简易纠纷没有解决渠道，只能被迫抢占本已匮乏的诉讼资源，法院系统的工作压力将要雪上加霜。“萝卜快了不洗泥”，连锁反应之下的法院审判质量必然大受影响，引发社会群众不满。因此，人民调解工作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诉讼补充，而是与诉讼同为社会冲突解决模式的基础部分。社会各界只有摒弃了对人民调解的偏见，才能促进人民调解的不断发展。

二、人民调解机构应将群众自治与政府引导相结合

经过多年发展，人民调解组织现已遍及“村-镇-县”等基层各个层级，同时各地还纷纷在交通、物业、医疗、劳动等领域成立了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基本形成了纵横严密的调解网络，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提供了完善可靠的组织基础。在布局草创阶段，司法行政部门通过各种行政命令、考核、评比等，为人民调解组织的发展完善起到了关键性的主导推进作用。但随之而来的是，很多人以为调解机构有着天然的行政属性，属于代表政府的纠纷解决组织，乃至在司法行政部门内部，这种认识也被广泛接纳。很多地区将设立事业单位性质的调解组织视为政绩、纳入考核，进一步增强了调解组织的行政属性。人民调解机构的人员基本都由司法行政部门选派担任，而非通过基层辖区群众选举产生。

关于人民调解机构的组织性质，《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指出：“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这一精神在 2008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俗称

“三定”方案)中亦有体现。《通知》指出,司法行政部门是“指导、监督”而非“管理、实施”人民调解工作。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人民调解机构的群众自治组织性质十分明确。

综上所述,理论上人民调解机构确属群众自治组织,但在实践中又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参与推进。这其实是反映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分界问题。国进则民退、民进则国退,但国、民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最优的平衡点。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有意识地遏制人民调解行政化的惯性趋向,积极探索出一条若即若离的指导新模式,既能在《宪法》的框架内充分释放人民调解机构自治组织的活力,又能贴合社会实际需求强化政府对人民调解的引导规范。

三、人民调解是更应该重技术含量

人民调解虽然源远流长,但古代历朝政府始终对其采取无为而治的消极默许态度,鲜有官方层面的正式总结、提炼和推广。建国后人民调解的发展亦非一帆风顺,而是呈现U型曲线的发展走势,一般认为2002年才是人民调解重新发展的起步之年,短短十余年间尚未形成普适、科学、有效的调解规范。2012年,司法部发文表彰了全国1609名“人民调解能手”。各地在宣传报道中,大多着重宣传调解能手情系群众、公道正派、不辞辛苦等个人品格方面的优点,很少谈及调解能手的方法科学不科学、程序规范不规范、准绳严格不严格。这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即在

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过于依赖调解员个人经验、能力和威望的不良倾向,更有很多地区在宣传中偏爱夸大调解工作的艺术色彩。这种调解艺术化的倾向,既导致了优秀调解员的成功经验难以复制推广,更严重的是差异化极大的调解过程还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调解“和稀泥”的偏见。全国遍地开花十分盛行的个人调解工作室,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一问题。

按照哲学上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对待,既然矛盾纠纷千差万别,我们似乎也应认可调解过程和调解结果的千差万别。但实际上,矛盾纠纷的冲突根源、涉及人群、演化趋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致性,尤其是同地区、同行业或同领域的矛盾纠纷,更有着较高的共性特征。我们应当据此大力挖掘调解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制定出细致普适的调解程序,总结出适合推广的调解模板,快速批量地培养出能够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的合格人民调解员。在这个基础之上,政府部门方可鼓励调解员充分发挥个人特点,探索形成具有鲜明个人特征的调解艺术。

四、人民调解的功能定位是管理纠纷

调解成功率一直都是人民调解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设立这一考核指标的初衷应是希望借此来直观体现各地调解工作的实际成效。但在目前,全国各地的调解成功率都不可思议地达到了95%左右甚至更高,司法部的年度工作报告提及,2013年全国调

解成功率高达98%。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国外调解成功率的均值仅为60%。这一畸高的数据,要么让人对其产生不可尽信的怀疑态度,要么让人对其产生包治百病的过高期待。在实践中,为了实现这一高指标,基层一般采用“先调解、后立卷”的做法,调解成功则建立卷宗档案并纳入统计,调解失败则视作未曾受理。这样一来,调解成功率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本来意义,无法为评价人民调解的工作绩效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虚假畸高的调解成功率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有害无益。它反映了我们对调解的功能定位存在着较强的功利性,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千差万别、层出不穷,无论是诉讼、仲裁,还是信访、调解,都不可能全面彻底地化解各自承接的纠纷争议。与诉讼、仲裁和信访一样,调解工作的本质是要实现对矛盾纠纷的一种可控管理,引导社会成员采取合法途径解决纠纷,最终通过妥协、退让达成协商、共赢,从而最大限度避免出现私力救济。从这个意义出发,过高的调解整体成功率从来不该成为追求目标。政府部门应宽容看待调解的整体成功率,科学改进成功率的考核方法,只有真实反映各地区、各行业调解成功率的区别差异,才能准确提炼出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找出由于共性问题导致的不足,从而对症下药,不断促进人民调解工作的科学发展、均衡发展。

作者单位:常州市司法局
(责任编辑:许健)

纵论民国初期的武进市

宗清元

常州地方自治，从酝酿启动至结束，只有三四年时间，有的项目未完，或只有规划，还未来得及实施自治公所就停办了，但都是筚路蓝缕开常州先河的。

武进市的名称，在历史上曾用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12年3月至1914年3月，第二次是在1995年8月至2002年4月撤市改区，由于名称相同，有些文章误把这两次出现的武进市都看作是现在武进区曾经用过的行政建置，其实不然，它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民国初期的武进市，是一个范围很小，受官衙监督，“以地方之人，就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的独立自治机构，它不具有官署行政职能，主要任务是处理自治范围内的市政建设、规划教育发展等事务，它是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是武阳城厢地方自治公所的延续。

一、地方自治缘起

地方自治是清政府推行君主立宪，实行政体改革衍生、持续发酵的结果。清政府推行政体改革是不得意而为之。

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列强入侵，割地赔款，全国各地革命起义不断，清王朝内忧外患，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根源在于封闭的“专制政体”，中国若要生存，富国强民，必须学习西方法律制度，实行政体改革，特别是1904年，日本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为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在东北发生日俄战争，沙俄战败后，更加激起了国

人的认同，认为小国日本能够战胜传统欧洲大国沙俄，这不是“军队之竞争”，而是“政治之竞争”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日本之所以能够赢得战场战争，是实行了明治维新立宪治国，而沙俄还是沙皇独断专行，才导致失败，常州人赵凤昌，与江浙名流张謇、汤寿潜等人率先拟订《参考各国政史，拟请采用宪法，实行新政，以振积弱而图自强折》，上呈朝廷，谓“今环球之万国，政体虽有君主民主之不同，其主义均归于宪法。各国宪法不同，其宗旨均归于利国便民，顺人心而施政策，即合众力以图富强”，呼吁清政府仿照日本明治变法，“定为大清宪法帝国”，尽快实行政体改革，实权在握的慈禧太后面对知识分子的强烈呼声，这次没有像对待戊戌变法运动那样扼杀，主要原因：一是自己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狼狈逃离京城受到了奇耻大辱，顽固态度有所改变；二是迫于资产阶级立宪派“非立宪不足以振民心，非立宪不足以强国家”的强大舆论和革命党风起云涌、外患内困的压力，才不敢再置若罔闻，完全抵制，她以“君权不可侵损；服制不可更改；辫发不准剃；典礼不可废”为条件，勉强同意了宪政改革，于1906年7月下诏全国预备立宪，在中央筹设资政院（议院过渡组

织），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主张立宪派的知识分子看到清政府有所行动，欢呼雀跃，认为良好的愿望终于可以实行了，开始大张旗鼓投入到了这场君主立宪运动之中，可知识分子万万没有想到，立宪治国并非是朝廷的主观愿望，清政府其实只是想通过旷延时日的预备立宪，缓和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从而阻止革命发生，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对于立宪、开国会等并没有多少诚意，采取能拖多久就拖多久的办法，1908年颁布的宪法大纲以及《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把筹备立宪的时间路线图拖得很长，也就是说从1908年开始，要到1917年才正式颁布宪法，召开国会，其中有一个主要理由，强调国民知识低下，立宪治国必须摸着石头过河，慢慢来，第一步先从地方自治开始，然后到省，成立咨议局，等到条件成熟以后，中央再正式启动，结果导致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引发了四次声势浩大的速开国会请愿活动，导致辛亥革命提前爆发，清政府目睹幻想破灭，慌了手脚，宣布对预备立宪时间作重大调整，改为3年，妄想挽回颓势，但为时已晚，革命洪流很快席卷东南各省，清政府随即被推翻。

地方自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常州府根据1909年初清

政府颁发《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在人口相对集中、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实行自治，选定市区和通江乡（孟城）作为自治试点。

二、架构设置和运作模式

常州城区的“地方”自治走在全国前列，这与立宪派得力干将、常州孟氏兄弟有关。孟森、孟昭常兄弟俩国学基础深厚，他们一个是举人、一个是秀才，参与政治热情高涨，他们兄弟俩忧国忧民，面对国家内忧外患，寻求改变中国落后的良方到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留学，就是选学当时最时髦的法政专业。回国后，以“中国最开通之第一埠”的上海作为活动大本营，在立宪运动中极为活跃，受到立宪派大佬张謇等倚重，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第一个立宪政治团体，即预备立宪公会中任驻会干事（相当于正副秘书长），孟森同时进商务印书馆主编《东方杂志》，开辟宪政专栏，孟昭常主编《预备立宪公会报》，兄弟俩遥想呼应，大力宣传宪政知识，敦促清政府加快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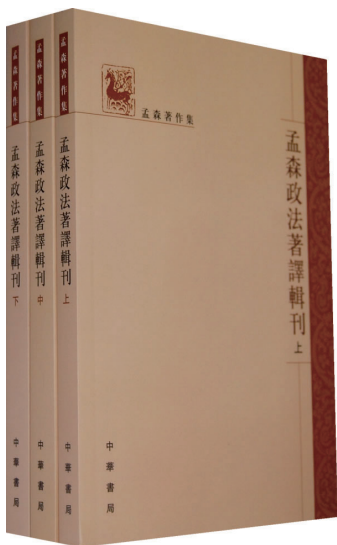
体改革步伐，在1908年8月底清政府刚刚颁发《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还没有颁发《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之前，孟森9月份就回到常州，召集有关方面在武阳商会召开座谈会，商量筹办地方自治事宜，发表演讲，地方工商界、教育界人士深受影响，立即拥护响应，著名士绅恽祖祁当场宣布捐资800银圆；商会、劝学所各出资100银圆作为地方自治活动的启动经费。

1909年1月18日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孟氏兄弟又充当理论到实践的引路人，他们著书立说，孟森立即撰写《地方自治浅说》《城镇乡地方自治详解》《城镇乡自治章程表》等；孟昭常撰写《地方自治纲要》《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等，作为全国的实践指导，同时在上海（隶属江苏）江苏教育会开办全国培训班，为各地参与筹办地方自治的士绅授课，传授操作、推行步骤，武阳商会商团（负责保护地方工商界财产安全的武装组织）负责人钱以振（商会第二号人物）、坐办（商会第三号人物）于定一和冠英两等小学堂监督兼总教习徐隽等参加培训，孟森抱着怀乡情结，亲自回到常州作实践指导。

常州地方自治启动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08年9月17日

至1909年7月17日酝酿筹办阶段，因市区涉及武进、阳湖两县县城，故名武阳咨议局事务所。第二阶段为1909年7月至1911年11月（辛亥革命后暂停活动近4个月）照章（根据清政府颁布自治章程）办事，选举议员，组建议事会、董事会等起步运作阶段，当时江苏省称咨议局（稍晚常州启动），为不与省同名，1909年9月改名为武阳城厢地方自治公所，所谓“城厢”就是把常州城区划定为自治范围，东至政成桥（白家桥），西至西圈门（西直街尽头），南至木梳街尽头，北至仁寿栅（原下街至铁路）。第三阶段为1912年3月至1914年3月全面实施推行阶段，这时派出机构常州府自应废除，阳湖县1912年1月1日撤销，并入武进县，地方实体行政建置只剩武进县，根据江苏都督府公布临时江苏省议会（由咨议局演变而来）议决暂行县乡制、市乡制，承袭前清继续推行地方自治要求，改“武阳”为武进市，名武进市城厢地方自治公所。

地方自治筹备工作在没有产生议事会、董事会之前，由地方工商界、教育界推荐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组成事务班子临时负责，推荐武阳商会总理恽祖祁任所长，庄殿华、恽用康分别代表武进、阳湖县任副所长，孟森的亲家钱以振和于定一任常务干事（相当于正副秘书长），常州府中学堂监督（校长）屠元博和庶务长（校办主任）朱稚竹、振声养根小学堂总董赵衡等21人为事务所干事，等到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后，开始选举议员，成立议事会，在议事会基础上，再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不得兼任议事会议员，议决和行政



分开，两会成立后，原临时负责筹办的所长、副所长以及干事自行解除，结束使命。

议员选举在年龄、财产、学历、职业等方面根据章程，有明确规定：第一，要在本地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3年以上；第二，要具有外国留学或本国学堂同等学力；第三是举人、贡生出身；第四是曾任实缺官职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过；第五是在本地有5000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第六是年满25岁；第七是寄籍要满十年以上或有1万元以上财产。凡有下列情形人员，不能作为选民和候选人：一是品行悖谬营私武断者（名声不好的劣绅、恶讼师等）；二是曾受监禁处罚者；三是营业不正破产者；四是在工商活动中失信有债务纠葛者；五是吸食鸦片者；六是残障心智不全者；七是身家不清（从事娼优活动）者；八是不识文义者（文化较低）。另外还规定，在任武进县、阳湖县地方官吏、军职人员、武进巡警局巡警等不得参与选举或被选举人选为议员、总董、董事，确保地方自治免受行政、军事等隐性势力干预，以体现独立、公正。

议事会共经历四届，第一届，1910年6月25~27日选举，当时调查自治区住户人口情况还没有结束，以5万人以上为标准，选出议员20名，他们分别是丁其朴、王觉、方育万、卢正衡、史成、史藩、史久传、冯教榦、庄俞、庄洵、刘承志、宋献、许焕、李嘉谷、沈廷扬、孟森、钱选、徐隽、屠雀，选举孟森为议长，史藩为副议长，7月26日议事会正式开始行使职责。孟森在任3个月，因筹办江苏省咨议局，任

书记长（秘书长），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常州，把议事会扶上正途后就辞职，递补史藩为议长，庄俞、冯教榦为副议长。后史久传、冯教榦、宋献又先后辞职，许焕病故；卢正衡、史成、庄洵被选为董事会成员（当然辞职），1911年3月3日又补选王頌霖、张奎曹、胡际云、金慕慈、钱青、屠亮、翁振铭8人为议员。1911年8月第一届任期届满，开始举行第二届议员选举，这时市区人口调查已经结束，超过10万人，议员增至30名（名字省略），史藩继续当选议长，庄俞为副议长。1912年9月和1913年10月，分别举行第三、四届议员选举，议员数不变，史藩、庄俞连任，增加沈秉厚为副议长。

董事会届数与议事会相同，第一届产生于1910年8月，选举史成任总董（主要负责人），庄洵为董事，于定一、卢正衡、瞿倬、曾省三为名誉董事；第二届总董为于定一，名誉董事增加到6人；第三、四届总董为钱以振，董事一直为庄洵连任。

地方自治突出标志是体现民主议事决策精神，议决问题不再是少数或个别人说了算，体现多数议员旨意，并且可以有人旁听，召开议事会议决事务“非有半数以上议员到会”，否则“不得议决”，议项目，凡涉及正副议长、议员及其亲属要回避，不得参与意见。董事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非董事会职员全数三分之二以上到会，不得议决”，议事会成员也要到会，但无表决权。议事会负责议决，董事会负责执行，它们既独立又相互制约，各施其职，避免独断专行，董事会在执行行政事务时，议事会负责

监督，避免结党营私等发生腐败案件，用孟森在《地方自治浅说》的话来说地方自治，就是要让“地方身受利害之人”，有“发表意见之权，所生真公共之利，所除真公共之害，使地方有进步无退步”，从而“积各地方之兴盛”，“成全国家之繁昌”，他告诫地方自治若要成功，首先是要司法独立，“千万不可再蹈吾国地方官兼司法裁判之弊”。

三、兴办市政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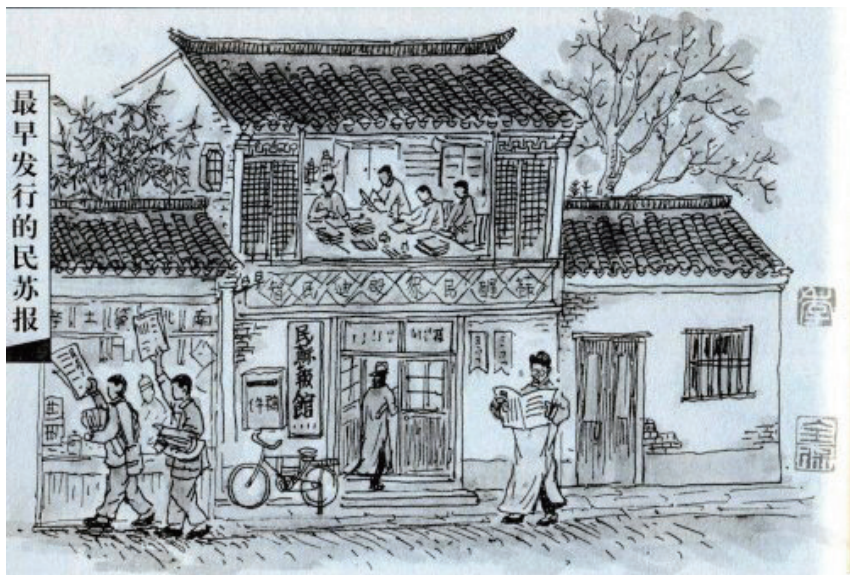
地方自治的主要工作是兴办市政建设。在这之前，常州的市政建设，滞后于工商业发展，由于过去常州府属各县赋税收入基本全部上缴国家，腐朽的清政府在列强入侵下，赔款负担加重，国库空虚，很少划拨费用用于发展城市建设，自治公所成立后，为常州的城市发展建设迎来了第一轮高潮。自治公所解决建设费用，主要依靠三个途径：一是以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为依据，让官署全力支持，将原属县公产管理处管理的忠佑庙、西真庙、三皇祠、乌龙庵、白龙庵、东岳庙、文昌宫等16处公产全部划给自治公所管理，自治公所利用这些祠庙在时代变迁中因荒废或不起作用“由死变活”，转租给有经济实力的工商界人士改为商用，收取租金；二是让商会配合，在税收之外加捐，凡实施的建设项目，坚持谁得益谁出钱原则，由得益的工商户摊派，由于经手办城厢自治的领头人都是商会大佬，他们拥有双重身份，具有较大的号召力，工商户需要商会商团保护（避免恶势力敲诈、抢劫等），一般都不敢抗拒；三是变卖荒地。根据江苏省咨议局

决议，凡自治范围内废地、祠庙废基、无主荒地都归自治公所办理，自治公所组织调查丈量，报县署核发产权证，由自治公所负责处理，自治公所根据地段的繁华程度，分五等标价出售。通过这些举措，筹集资金，解决市政建设费用，有力地推动了常州城市建设的发展。

四、推行义务教育

自治公所根据 1909 年江苏省咨议局三届二次会议“城镇乡自治公所负有设置初等小学之义务”要求，掀起发展教育事业热潮。原来市区小学除龙城书院改办的武阳公学(局前街小学)为公立外，其余均为私人创办，由武阳劝学所(相当于教育局)负责管理，1912 年 3 月劝学所撤销，除武阳公学和菱蒲巷粹华女校(改名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为县立公办外，其余 16 所初等(初小)、两等(高小)小学均被自治公所接管公办，开创地方义务教育先河，经议事会议决，接管后小学统一以市立第一至第十四两等、初等小学编序，局前街和池塘沿两所女子小学，被编为市立第一、二女子两等小学，以后有的合并，4~6 年级高小划归武进县公办，1~3 年级初小归自治公所，义务教育在民国初期开始飞速发展，原来包括高小在内 16 所小学，学生只有 1300 余名，到 1913 年 4 月自治公所停办，初小学生竟增加到 2000 余名。

自治公所不仅推动了义务教育蓬勃发展，同时在改造私塾出身老师，提高师资教育质量等方面也做了很多有益工作，过去学校多数老师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大多数人是私塾出身，国文基础



较好，但其它方面明显存在短板，教学方法等跟不上形势，自治公所针对这种现象，专门组织开办小学教员讲习所，聘请本地在国外留学回常的孙同康、卜中等新颖知识分子任小学教员讲习所讲师，讲授教育原理、教授法、新式学校管理、算术、体操(体育)等课程，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五、兴办文化事业

清末民国，随着外来先进文化的传入，新知识、新文化逐步在中国开埠较早的大都市——上海流行，接受这种辐射的最早推动者，莫过于自治公所，自治公所为民所想，针对民众迫切需要了解外埠世界的精彩，于 1910 年 10 月创设阅报社，订阅上海出版的《时报》、《新闻报》、《申报》、《神州日报》等放在市中心近水阁茶楼、天禧楼、大观园、状元楼、惠民桥茶馆等供人取阅，每天由茶馆老板兼管收拾，返回给自治公所，自治公所专门制作若干报框，挂在双桂坊自治公所门外，供民众浏览，由于报纸信息来得及时，传播快，很受读者欢迎，

后来报栏又扩大范围至南区(纺机坊一带)、西区(西直街一带)、北区(北直街一带)、中区(青云坊一带)等热闹街市，这些报纸因办在上海租界，不受清政府压缩干扰，冲击封建专制的观点鲜明，言论自由，被誉为“振懦之猛剂，救亡之良方”，对启迪民智，拓展民众视野，接受外来文化思想等具有深远影响。后来常州也有人效法，于 1911 年 9 月创办出版了常州第一份报纸——《民苏报》，自治公所大力支持，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民国后，该报支持国民党武进分部党员竞选国会议员，引起共和党武进分部地方首领钱以振等不满，停止资助。

自治公所兴办的另一公共文化事业是图书馆。常州图书馆的雏形，先由于定一、蒋维乔、庄俞、刘志扬等于 1904 年在铁市巷岳宅自发组织的藏书讲报社，他们每人将自己家里的藏书拿出来寄存在这里供人阅读，刘志扬曾留学日本，蒋维乔、庄俞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台柱编辑，他们见多识广，经常往来于上海和常州之间，

把从上海报纸上看到的新鲜事情“贩”到常州传播，藏书讲报社就相当于一个传授，交流文化的沙龙，吸引了很多追求新知识的年轻人光顾，武阳商会看到这里人气兴旺，决定创办图书馆这个公共文化平台，在双桂坊建造图书馆，自治公所于1912年3月加入，每月补助30元银圆，购置藏书，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使常州图书馆馆藏逐渐丰富，成为江苏省内办得较早、藏书较多的地方公共图书馆之一。

六、半途夭折停办

当地方自治正办得风风火火时，1914年2月3日突然接到大总统袁世凯签署停办指令，限定各地自治在3月31日之前结束，武进市城厢自治公所在3月29日

寿终正寝，编造账册、档案和所余款项等全部移交给武进县署。

结束语：地方自治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历史产物，推进的程度和效果，各地不尽相同，有的地方被劣绅把持，因透明程度不高，成了劣绅谋取私利的“契机”，引起社会质疑，非议之声不断，但常州却是例外，除了在设定自治范围因“扩展”到城郊结合的怀南、怀北、德泽、孝仁乡等部分区域发生矛盾之外，成效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也未发生任何营私舞弊等行为，究其原因是一发起人（孟森）和议事会议员民主意识强，他们中有很多人在国外留过学，在制订章程、办事细则上考虑周全，兴办的项目，从议决到实施都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执行者——董事会总董钱以振、于

定一口碑好、威望高，对每笔费用开支公布明细账目，以便议事会议员监督审核。

常州地方自治，从酝酿启动至结束，虽然只有三四年时间，有的项目未完，或只有规划，还未来得及实施自治公所就停办了，但仍然有很多亮点值得一记，如调查城区居住人口、编订门牌号码；规划道路建设；开办路灯、电话；清扫垃圾，设置垃圾窝点；支持办报，促进现代知识传播；推行义务教育；开设公园和临时医院等等，都是筚路蓝缕开常州先河的，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次推动了常州城市化进程的步伐，为常州城市建设发展描绘了最早的蓝图，开创了新纪元。

作者单位：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上接第40页）

的独立性。社情民意调查机构的独立性可以使社情民意调查结果免于来自权力的压力和影响，确保信息不被筛选，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真实。这需要大力培育民间调查机构，让其与政府保持适当距离，具有超脱性、专业性和客观性。另外，对于现有的官方社情民意调查机构，也应当加以改造，不断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创新运行机制，让其相对独立开展工作，其主管部门应当从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在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监管服务方面下功夫。第二，推行阳光民调。阳

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透明可以有效增加互信。社情民意调查工作本身就是收集民意，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和表达权，公众当然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这需要建立沟通互动机制，就社情民意调查工作全过程与结果与公众交流，而不应不公布结果或者仅仅把结果一公布就了之；要让社情民意调查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使公众增强了解、消除顾虑，进而赢得信任。

3. 制度规范保障。在现代法治国家，政府对于社情民意调查的管理和规范应该纳入法治的轨

道，社情民意调查的立法应该适时提上议事日程。在立法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至少要有科学、严格、规范的行业标准或者制度，对社情民意调查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行为规范、责任承担等作一些基本的规定，对一些社情民意调查造假现象和违规行为规定相应的惩处措施，使社情民意调查活动有章可循，有标准可依，政府监管有据可查。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统计局

（责任编辑：叶英姿）



这两年，习近平带火的9个热词

热词1：中国梦

【习语】“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背景】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全面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

2013年3月17日全国两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都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热词2：底线思维

【习语】“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背景】据《学习时报》报道，习近平在2013年初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底线思维是以底线为导向的一种思维方法和心态，它要求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是对意识形态领域规律的整体性把握，要求我们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自觉顺应规律，客观分析宣传思想阵地管理中每个细节、每个可能出现的问题，妥善解决各种问题。

热词3：“老虎”、“苍蝇”

【习语】“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背景】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十八大以来至今，共有61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显示了空前的反腐力度，展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决心、胆略和魄力。

热词4：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习语】“开展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要坚持主题不变、镜头不换，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坚决反对‘四风’，推动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

【背景】2014年1月20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反腐方面非常善于用比喻说话，从“打铁还需自身硬”，“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到“刮骨疗毒、壮士断腕”，显示出党狠抓自身建设毅力和决心。

热词5：时间都去哪儿了

【习语】“你知道，承担我这样的工作，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时间。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

【背景】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在索契接受专访时感叹。

习近平善于采用民间流行元素，真诚中不乏幽默感，言谈中一改领导人的神秘形象，坦诚自己的生活是“累并快乐着”。2013年接受巴西记者采访时，他则说自己“偷得浮生半日闲”，只要有时间，就同家人在一起。

热词6：人生的扣子

【习语】“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背景】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和师生交流。

习近平说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年轻人要抓住价值形成的重要时期。朴素比喻和谆谆教导，显现出他对年轻人溢于言表的期望。

热词7：新常态

【习语】“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

【背景】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及“新常态”。

此后，11月9日他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全面阐释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即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习近平指出，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此后“新常态”一词扩展到政治、外交等各领域，获得地方省市的热烈响应，也受到国际媒体的热捧。

热词8：一带一路

【习语】“要做好一带一路总体布局，尽早确定今后几年的时间表、路线图，要有早期收获计划和领域。”

【背景】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倡议愿和东盟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构想一经提出，便在同年11月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成为国家战略。

热词9：APEC蓝

【习语】“有人说，现在北京的蓝天是‘APEC蓝’，美好而短暂，过了这一阵就没了。我希望并相信，经过不懈努力，‘APEC蓝’能保持下去。”

【背景】2014年11月，习近平为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贵宾举行欢迎宴会时的讲话。

习近平对雾霾问题不藏着掖着，在各国政要面前开诚布公，承认PM2.5这个不速之客是中国“成长的烦恼”，“整治污染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绿水青山亦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朱元璋狠揍茹太素

1376年，司法部副部长茹太素给朱元璋打了一份报告，长达17 000字，朱元璋看得眼花，就让秘书王敏念给他听，都念到6 300多字了，还不知道要说啥。朱皇帝实在受不了，当场找人把茹部长狠揍了一顿。第二天又让王秘书接着念，从第16 500字到结尾，茹太素提了五条工作建议，这些建议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朱皇帝采纳了其中四条。

事后朱元璋苦笑说：“当大臣不容易，当皇帝又容易吗？我需要的是接地气、解难题的意见建议，可明明500字就能说清楚，这老茹偏要整一大堆没用的，真耽误事。”

一直有人对朱元璋暴打茹太素有看法。对下属一不合意就动手，作风确实简单粗暴，但了解背景后，对事情的理解会更全面。

朱元璋定都南京时，新政权面临大量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内外形势都很严峻。战后社会经济凋敝，土地不均，农业基础设施阙如；饥民遍野，人口数量下降；各业不兴，社会无法正常运转；矛盾尖锐，官民冲突时有发生。退居塞北的残余势力企图卷土重来；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日渐强大，虎视眈眈。

特别是进城之后，明政权中许多官员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各派人马争权夺利，贪贿成风。中央政府权威低下，政令不出南京城。官风虚头巴脑，政权在文牍中空转。总之此时朱家王朝基础不牢，随时可能夭折。

朱元璋忧心如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作了一系列的重大整顿和改革。

就在狠打茹太素这年，朱元璋废除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设“三司”分管行政、军事和司法，构建了明王朝的行政和统治架构。

他借鉴汉初经验，实行轻税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各种措施，创新惠农利民政策以收拢人心。在打击贪腐方面，朱元璋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卖力，其手段之残酷可谓空前绝后，明初吏治因此稍微清明，政权的合法性迅速得到社会承认。

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在改善文风、提高效率上动了不少脑筋。就在狠揍茹太素之后，他命令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现存朱元璋的许多重要指示，干脆就

是口语，乡下老太太都能听得懂记得住，这在历代皇帝中极少见。

制度加榜样，不着边际、不负责任的议事方式逐渐改变，使得明一代公文比较简练有骨，行政效率较高。明后期有两个懒皇帝二三十年不上班，政权竟照常运转，不能说与此无关。

史家认为，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封建君主之一。他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不但打下了明朝200多年基业，还影响到清朝，所谓“清承明制”。自明到清，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渐趋完备。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史鉴凿凿。试想，当初如果朱元璋放任官员队伍混日子、玩虚的，把时间年复一年耗在文字游戏中，不要说成就伟业，就是当个“维持会长”都很难：以当时的形势，朱氏很可能像后来的李自成一样昙花一现。所以，茹太素这样没有使命感、紧迫感的官员，遇到有抱负、真干事的朱皇帝，不挨揍才怪！

（《中国历史的教训》中信出版社，习骅）

中国需要新一轮文化觉醒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重返它的语境，回顾百年的历史发展与思想变迁，对于今天的中国仍有价值。较之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觉醒意识。

所谓文化觉醒，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思想观念变化，而是唤醒沉睡或被束缚的自我意识，对世界、民族和个

人前途命运进行科学理性地自觉认知和践行追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旗手向束缚民众思想的封建道德礼教发起猛攻，启发民众觉悟，革新思想。这是封建道统断裂的开始，也是新的文化觉醒的开端，乃至以后历史行程中发生的文化觉醒现象，大都可从新文化运动中找到渊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被新

文化唤起的千百万民众，特别是湖南农民，组织起来，冲破帝国主义和军阀编织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奔跑。这正是发生在农民身上的一次文化觉醒。文化觉醒走向社会实践，文化人也转向服务时代，正是面对没有文化的民众，才有了延安文化的大众化品格，才有了与工农相结合的文化追求。

没有新文化“自觉”的人，就没

有独立自由民族的产生，这个新文化思想家的观点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印证。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而抗日战争又是中华民族最深刻最广泛的文化觉醒。抗战刺激了民族凝聚向心力，过去盘算自家庄稼和牛羊的人们，开始深刻思考民族存亡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建国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觉醒又转换为新中国的文化改造和演进。用唯物史观改造唯心史观，用无产阶级思想代替资产阶级思想，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文明先进的新中国。如今，21世纪的中国正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门槛上，而这个复兴的

历程仍然要以文化觉醒为条件。

这个文化觉醒，一是表现在敢于在西方文化面前充分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同时又要善于将外国经验中国化。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是发达国家现有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所没有遇到或没有条件遇到的。因而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理论，未必适应于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这就需要我们保持文化觉醒的状态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大胆突破西方观念的禁区。

当代文化觉醒的另一表现，是敢于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中国近现代历史已经决定了“旧文化”衰落的基本走向。具体说来，这种所谓的“旧

文化”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而我们现在强调要弘扬的传统文化，则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以来，“旧文化”一直没有自认失败，而总是企图利用新形式作祟，对此我们要加以防范。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仍要秉承百年来的文化觉醒意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使其成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

（环球时报2015年4月16日，王传利）

构建大国心态是中国的一场硬仗

中国传统文化是不缺大国情怀这个元素的。古代中国一直称自己为天下的中心，视周围世界为蛮夷。东亚地区围绕中国有时断时续的朝贡体系，万邦来朝是中国人心中“盛世”的标志性景象。

中国社会需要从历史悲情重回大国情怀，但不是要再次掉入封建式的帝国自大。我们需要有与中国作为现代崛起大国相称的国民心态，而这当中的最大障碍就是近代中国遭欺受辱留下的阴影，以及它与古代中国辉煌之间巨大反差带来的困惑。

中国崛起的速度太快，要让社会心态的调适追上这个速度不是件容易事。比如中国在不久前还是最大的净受援国，今天国家虽然强大了，但发展不均衡，一些省区仍有不少贫困现象。舆论对国家开展对外援助常有微词，致使政府在对外援助这种本该大力宣传的事情上被迫低调，有时“只做不说”。

再比如民众在对外摩擦问题上非常敏感，常常要求政府“只赢不输”，甚至“只进不退”，这极大限制了国家开展外交的灵活性。有时候一些小国领导人做针对中国的示强表演，也会让我们很生气。从官方到民间，有

一句话过去的使用频率很高，那就是：外部的某个挑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必须不断在精神上走向强大。这种强大决非仅仅来自领导层的意志，民间的心理成熟构成了它决定性的底蕴。

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获得震动世界的初期成功，到昨晚有47个国家申请加入，这大大超过了美日主导的亚开行的起步。仅仅这一件事，就在把中国朝着“真正大国”的地位推。然而加入的国家越多，围绕亚投行今后的事务越“人多嘴杂”，中国赢得“一致掌声”越不现实。我们很快会感受到国际多边银行“主导者”的那把交椅多么“硌屁股”。

其实亚投行能够成立，这本身对中国就已是件好事。但当今世界的好事越大，注定麻烦越多，而且任何“领导者”都休想“赢者通吃”。越是大国，越遭埋怨，越干好事，越被挑剔。

中国社会曾长期处于国际主流事务的边缘位置，我们质朴，诚实，看重荣誉，也难免有时“认死理”。然而做大国是“复杂运动”，它要求我们要有韧性，敢进敢退，拿得起放得下，最终不在朝向四面八方的接触中消耗

自己，而是赢得总得分的胜出。

中国必然要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但这不等于“吃亏”。因为中国在世界上的份额持续增大，我们从世界健康秩序的获益面同步拓宽。中国今后不能在外援等方面算小账，我们的胸中应是一盘中国与外部世界共赢的大棋。

分享世界“领导力”有许多将要付出的代价。但中国发展是惯性的，我们既无缩小国家实力的退路、也永远“韬光养晦”下去的逍遥选择。做大国很累，我们既要劝别人，更要劝自己，有时不得不“难得糊涂”。否则我们就会有较不完的真，生不完的气。

像中美俄这样的大国，实际已不存在可以扳倒它们的外部力量。它们真正的对手其实都是它们自己。国家与人一样，离不开精神的“修炼”，我们从外部很容易看到其他大国的弱点，而我们自己又岂能完美无缺。让公众的主流思想方式和集体视野与大国使命相匹配，这是中国社会必须打赢的一场硬仗。

（环球时报2015年4月1日）

制造强国的历史抉择

自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发达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通过所谓的“再工业化”不断占领制造产业发展制高点，主导世界产业发展大势。不断持续的这种状况，给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形成巨大压力，给中国经济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中国要成为产业革命的赢家，要成为先进发达的世界强国、世界大国，重要的前提是要成为世界制造强国。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政府应对德国工业4.0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浪潮的顶层设计和行动路线图，是建设制造强国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等十大领域，推出中国的创造、中国的质

量和中国的品牌，这也是一个世界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

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质量体系。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在战略性、前沿性制造领域，中国应该掌握整机或关键部件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处于这些产品价值链的高端和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同时，建立起世界领先的生产技术参数体系，构筑国际公认的制造质量标准体系，在高端制造和主流制造品方面，建立起“中国质量”信誉，打造“中国制造”标签，引领制造领域重要行业的发展方向。

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中国应拥有享誉全球的著名企业和著名品牌。一个行业是否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是否拥有了全球著名的企业和著名品牌。中国在重点突破的制造领域应培育出处于全球顶级地位的著名企业或著名品牌，某些行业的主导产品应占有较大的国

际市场份额，拥有全球行业制造品的定价权、质量认证权、国际话语权，重要行业要成为全球发展的旗帜或标杆。

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中国应拥有强国重器和创造性产品。强国重器或大国重器，是代表世界顶级制造技术的制造产品，体现当代世界最前沿的制造技术，其在一段时期或较长一段时期内，不能为一般国家模仿制造，是独一无二或少有国家才能制造的创造性产品，通常体现为高端重型装备制造品、制造技术最前沿最复杂制造品、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最先进制造品。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中国在某些制造领域应当拥有独一无二的绝门技术，具备独领风骚的制造能力。

（《光明日报》2015年4月22日，李金华）

中外引才思路差异有多大

1. 如何引才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对外来种族所采取的包容性态度以及开放的移民政策，如办理“绿卡”吸引在美留学的海外高端人才，增强了美国人才竞争力。老牌工业强国德国则努力顺应人才国际化的趋势，从原先抵制外国移民转变到积极制定移民政策上来。日本并非移民输入大国，其移民政策严格且外国人居留条件复杂，其吸引高端人才主要通过发展涉外经济，接纳外国留学生等途径。新加坡通过基于市场价格机制的签证制度和便利

的居留政策留住海外高端人才。中国的移民政策不断优化，以“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环境留人、事业留人”，不断创造条件吸引国外高端人才流向国内。

第一，政府层面。美国弱化政府功能，在高端人才引进培养方面按照“有限政府”的原则，更侧重于市场化配置高端人才资源。德国政府在坚持高端人才引进培养市场化的同时，强化对社会公平的干预。政府引导下的市场主导催生了人才发展的内在活力。日本与新加坡政府在高端人才引进

培养方面都发挥主导作用，日本政府从战略高度制订了诸多高端人才引进培养计划，有效优化了高端人才结构，显著提升了人才竞争力，而新加坡政府主动吸收外国先进经验，改革移民制度，提供优惠激励政策，打造人才成长“软环境”。中国政府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先后颁布多项人才政策和启动多项人才专项计划以吸引国外高层次人才。中国政府在引进培养高端人才上扮演主导角色，形成“党管人才”的独特模式。

第二，高校和科研院所层面。美

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力量雄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高端人才，其在不断提升教育科研水平的同时还与企业合作建设高新园区。德国立足高等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教育科研基地的建立实现了企业与高校的紧密合作。日本在建立海外实验室网罗高级人才的同时，不断改革教育制度，提升高端人才培养能力。新加坡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培育创新精神，加快前沿科研成果转化速度。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所在政府政策倾斜下积极引进和培养高端人才，在太空、基因工程等尖端领域取得重大成果，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了大批精英。

第三，企业及社会组织层面。美国众多公司进入“世界五百强”，整体实力强劲，跨国公司以国际合作推动高端人才的集聚，充分开发和利用高端人才。民间社团“德国学者协会”专为那些身在海外的优秀人才回国工作牵线搭桥。日本高科技企业注重聘请海外专家，终身雇佣制保障了高端人才的长效合理使用，而诸如“技术研究协会”等社会组织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促进了高端人才的成长。新加坡在培育企业及社会组织方面经验丰富，海外联络组织使高端人才缩短适应环境的周期，提高了工作效率。中国跨国公司和社会组织近年来实施“走出去”战略，跨国公司不断拓展海外市场，社会组织与国际民间组织合作频繁。

2. 怎样用人

第一，人才选拔机制。在美国，劳动力市场调节人才选拔。在竞争选拔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应聘者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工作热情的员工一般会受到青睐。德国在坚持市场化选拔的同时，倾向接纳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员工。日本企业采取多种形式选拔人才，严格规范选拔程序。与日本严格人才选拔机制相比，新加坡更注重人才的合理配置。这得益于新加坡采取双轨制分流教育，它对不同的学生实施不同程度的教育，培养各专业技术领域精英人才。中国高端人才的选拔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按照市场需求，推进人才合理高效配置。

第二，人才培养机制。美国在长期的高端人才管理实践中构建了成熟完整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社区学院与企业“合作教育”延伸了人才培养范围，有效整合了培训的师资力量形成教育合力。德国十分注重在职培训，坚持给员工更多机会参加教育培训，鼓励高端人才不断充电。与德国重视培养实践经验不同，日本企业在培训内容上突出道德教育，努力培育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文化和精神，增强员工的忠诚态度，从而发挥高端人才素质优势。新加坡将专业培训与社区培训相结合，开拓了高端人才培训的深度和广度。中国人才培养仍处于“自上而下”的发展阶段，国家鼓

励企业组织职业培训，加强培训基地建设，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培训模式。

第三，人才评价机制。美国和德国的人才评价强调平时表现和绩效考核相结合，而最终考核结果与薪酬待遇相挂钩，竞争机制巧妙地嵌套在评价机制内，成为高端人才管理的重要手段。与美德重视绩效考核一样，日本企业在考核指标上狠做文章，制订了科学严格的考核制度，对考核不合格的员工适用人才退出机制，优化了高端人才结构。新加坡对人才引进舍得投入，但对人才的实绩考核和解聘十分严格。中国积极借鉴国外人才评价经验，推进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化，在配套的奖惩措施下实现人才的合理性流动。

此外，美国和德国通过设置各领域尖端奖项，以个人荣誉和丰厚的奖金激发高端人才发挥智力优势。日本坚持利用有力的激励政策留住人才，十分注重通过制度化的操作手段实现高端人才的稳定性，欢迎员工参与决策管理。新加坡坚持“人才立国”的理念，制定了极具吸引力的激励政策，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评价奖惩机制。相较于新加坡和日本，我国人才激励政策机制目前还不够健全，但对引进高端人才的奖励力度空前。

（《光明日报》2015年4月18日，殷凤春）

没有一朵花在自闭中灿烂

1935年，时任国立青岛大学教授的梁实秋，将自己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辩论的文字结成《偏见集》出版。梁实秋的文字一向细腻、雅致、从容，他对此书非常自信。刚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李长之阅读后在《国文周报》撰文评论。李长之同意《偏见集》中的一些观点，也认为文学是人性的

发扬，但觉得梁实秋“缺乏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作为文学批评的准绳”，“伦理的立场太过，而哲学意味的兴味还太少”。梁实秋的好友闻一多看到了李长之的评论文章，感觉很有见地，当即写信告诉梁实秋。梁实秋找来文章，一字一句地读了。他极其欣赏李长之犀利的眼光和举重若轻的文笔，

主动写信与李长之联络。李长之是家中长子，刚失去父亲，一时又找不到工作，生活非常困难。梁实秋尽其所能，处处予以关照。1936年，梁实秋主编《北平晨报》的文学副刊，让李长之以“失言”的笔名在上面发表了许多文章。后来，梁实秋编《自由评论》，每期都会为李长之预留20元稿费，就算文

章没有写出来，也可提前预支。

同样温馨的故事也发生在梅兰芳与齐如山身上。1913年某日，梅兰芳演出《汾河湾》，看了表演，齐如山给梅兰芳写了一封约3000字的长信，信中这样说：“昨观《汾河湾》，演得很好，一切身段，都可以算是美观，尤以出入窑的身段最美……此戏有美中不足之处，就是窑门一段，您是闭窑后，脸朝里一坐，就不理他了，这当然是先生教得不好，或者是看过别人的戏都是如此，所以您也如此。这是极不应该的，不但美中不足，且甚不合道理。有一个人说他是自己分别18年的丈夫回来，自己虽不信，当然看看也有点像，所以才命他述说身世，意思那个人说来听着对就承认，倘说得不对是有罪的。在这个时候，那个人说了半天，自己无动于衷，且毫无关心注意，有是理乎？……再者听到他当年夫妻分离的情形时，自己不动心不难过吗？所以此处巨角必须有极

切当的表情，方算合格，将来方能成为好角。吾把生角唱时，对某一句应有怎样的表情，大略写在下边，请您参考。”那时的官宦子弟是非常忌讳与戏子来往的，齐如山写了这封信，也没怎么当回事，没想到10多天后，梅兰芳重演此戏，竟完全按照齐如山信中所写改演。齐如山知道这个消息，自然非常高兴。此后，梅兰芳每演一戏，齐如山必写一信，梅兰芳也一定会从善如流，两年时间，齐如山居然写了一百多封信。他们合作了20年，齐如山为梅兰芳策划过的新戏先后有《牢狱鸳鸯》、《嫦娥奔月》、《黛玉葬花》、《麻姑献寿》、《上元夫人》等数十部，其中很多戏成了梅兰芳的保留剧目与京剧的流行剧目。

对他人提出的意见，当事者愿意接受，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胸襟、一种谦逊，但这其实是拔高了当事人，贬低了提意见者。在我看来，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是美德，而是智慧。人

都是需要成长的，要成长就必须学习，我们找私人老师、进学校接受教育，目的都是为了心智上的成长。但无论是拜私人老师还是进学校读书，都必须付出物质代价，这种代价往往以学费的方式出现，而以提意见者为师，什么物质代价都不必付出，却同样可以学到真东西，这是何等划算的事。

虚心与地位、金钱、名气无关，只要抛弃一点虚荣就行了。梁实秋身为名教授，却诚恳接受普通学生的意见；梅兰芳已享盛誉却认真倾听票友的见解，无非是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将自己还愿成一个普通人，不高己卑人而已。而他人也从他们的谦逊中得到了激励，李长之、齐如山最后都成了当事人长久的好友，就是一种证明。

世界上没有一朵花是在自中灿烂的。

（《钟山风雨》2015年第2期，游宇明）

其实，我们皆需觉醒

“心里不平衡”，是贪官忏悔录中出现的高频率词汇。看到别人提拔比自己快，心里不平衡；看到老板住豪宅开好车，心里不平衡；看到周围的人迅速富裕起来，心里不平衡……心理失衡，正是因为贪欲——这头隐身于人心中的饕餮巨兽被释放，它一口一口咬噬人的良心、信念、心智乃至一切。

托尔斯泰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想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上帝就对他说，清早，你从这里往外跑，跑一段就插个旗杆，只要你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来，插上旗杆的地都归你。那人就不要命地跑，太阳偏西了还不知足。太阳落山前他是跑回来了，但

已精疲力竭，摔个跟头就再没起来。于是有人挖了个坑，就地埋了他。牧师在给这个人做祈祷的时候说：“一个人要多少土地呢？就这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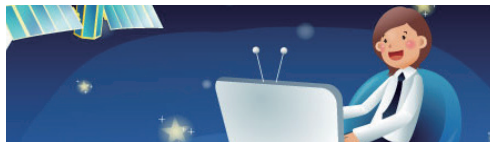
再来看看我们的落马贪官：他们中不少人吃过苦、奋斗过，甚至带着理想和抱负踏上仕途，然而当他们手握权柄，面对“势利之熏灸，妻子之浸淫，朋比之怂恿附和”，终究让贪欲蒙蔽了初心，曾经的抱负和理想、人生的价值在与面子、待遇、享受、派头的比较中，显得那样的微乎其微。但到头来，任由贪欲操纵的人生舞台会怎样落幕——“还有几年我可以退休了，如果没有触犯法律，凭

着现有的待遇我可以很好地生活。但是这一切于我已成了不可能”“我后悔深陷贪欲陷阱不能自拔。收受的那些钱物，非但没有让我心生喜悦，反倒成了我秘不示人的思想包袱和精神枷锁”“贪来的钱物只是今天一时的，而不是你永远所有的”……

被欲望葬送的贪婪者，古往今来，数不胜数。

巴尔扎克说：“贪心好比一个套结，把人的心越套越紧，结果把理智闭塞了。”著名作家周国平的《人生的三个觉醒》，有助于我们解开这个“套结”。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5月1日，张欢）



■ 社科联举办“人文养心”学术沙龙

为提升机关人员“学养、涵养、修养”水平，建设实力社科联、魅力社科联，和谐社科联，社科联机关工会于近日启动了“人文养心”系列活动。4月24日，以“快乐工作，愉悦相处，共建共享，品质生活”为主题的首场学术沙龙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围绕“人文素养在人生旅途中的地位 and 影响，社科人应有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以养心提升人格魅力和生活幸福指数”三个主题展开发散性讨论，机关全体人员以及3位特邀社科专家提前做了深入思考，会上作了精彩发言，



在思想交流碰撞的同时，使全体机关工作人员感受到了一场精神的大餐和心灵的洗礼。

陈满林主席对本次活动做了总结，认为本次主题沙龙选题精到，组织到位，每个人都结合自身，结合实际做了很好的发言，触及灵魂，给人启迪。展现了社科人的风采和魅力。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文素养，陈满林主席认为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要自尊和自重。维护好人文社科以及社科工作者的的尊严。二是要自信和自觉。校正人生坐标，扮好角色，唱好大戏，建好共有的精神家园。三是要自省和自励。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不断加强修炼，不断提升自己人生的底色。



常州工学院思政教学部党总支书记王萍霞认为，人文养心重在内心的强大，而阅读的积累和生活的积淀是关键，社科人一定要静下心来读书，把读书作为一种习惯长期坚持下去，必将有大的收获。



罗志平副主席认为，心胸放宽些，事情看淡些，心情愉悦些，开心工作，开心生活，这是社科人要努力追求的精神境界。



叶英姿副主席指出，广博解决气度，淡定解决气质，人文养心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张步东副主席认为，人文素养，关键在“素”养，不能“荤”养，贪欲过多，心灵就会迷失方向。

科普部副主任朱玉川认为，亲近风雅、优雅，让心灵得到滋养，让人生境界得到提升，不失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



办公室副主任李军认为，在当前社会人文素养不断弱化的今天，人文社科工作者要勇于站出来，自觉接受人文精神的熏陶和滋养，用自己的行动让社会看到人文社科的魅力和力量，为社会风气的扭转积攒力量。



办公室主任耿丽珍认为，一个人的人文素养越高，他的内心就越柔软，就会越平和，越容易与人交往相处。

常州大学宣亚雷博士认为，仓廩实而知礼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人文素养也会越来越高。



江苏理工学院副教授陈雅娟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心大，世界就大；心小，世界就小。阅读和旅游是让内心变得强大的重要途径。

办公室副主任科员许健认为，粗糙的生活态度，精致的内心是健康快乐的“不二法宝”。



学会部副主任科员陈建萍引用佛教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畅谈了自己加强内心修炼的心得与体会。

“社科专家面对面”第二讲讲述刘国钧的故事



2015年4月11日下午，“社科专家面对面”第二讲由刘国钧文化中心做题为“刘国钧——常州的

骄傲”的讲座，是抱着对刘国钧先生的敬仰之情、爱戴之情而来，更是为学习

弘扬刘国钧的爱国精神、创新精神、

图书馆

多功能厅座无虚席，近百位来自常州社会各界的听众认真听取刘国钧的故事。这些听众中，有高校学生，有少年儿童，也有白发苍苍的长者。大家来听

实业报国精神而来。

王亮伟重点阐述“刘国钧是常州值得骄傲的人物”的三个理由：其一，刘国钧是传奇式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其二，刘国钧的大成企业成为中国纺织工业的经济符号；其三，刘国钧是常州特有的精神文化现象，并在近现代对常州历史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讲座以故事的形式，深入浅出、精彩生动。听众被深深吸引，收获颇多，并进行了积极互动。青果巷八桂堂刘氏旧宅管理员巢长福等人热情参与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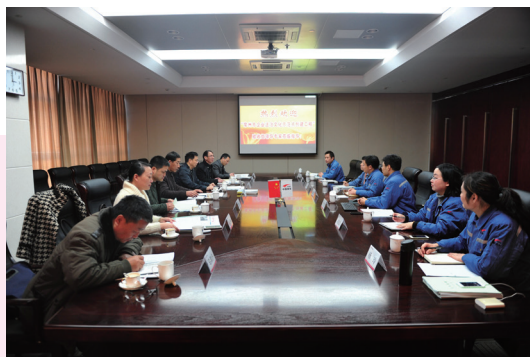
走访企业共叙发展话题

市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宋正杰、法规处处长周天福、企业法制工作协会秘书长邹云帆等一行人先后走访了江苏洛克电气有限公司、四药公司、黑牡丹有限公司、月夜灯芯绒有限公司、纺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等会员企业，共叙发展话题。

在座谈中，企业老总们纷纷畅所欲言：围绕当前政府改革开放，行政审批权限下放，简化审批手续等措施，在深入交谈中认为，深化审批改革的攻坚任务仍然繁重，对前置审批的改革涉及不深，中介服务市场不成熟，管理失范的问题仍然突出。如何控制和防止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发生是当前各级行政部门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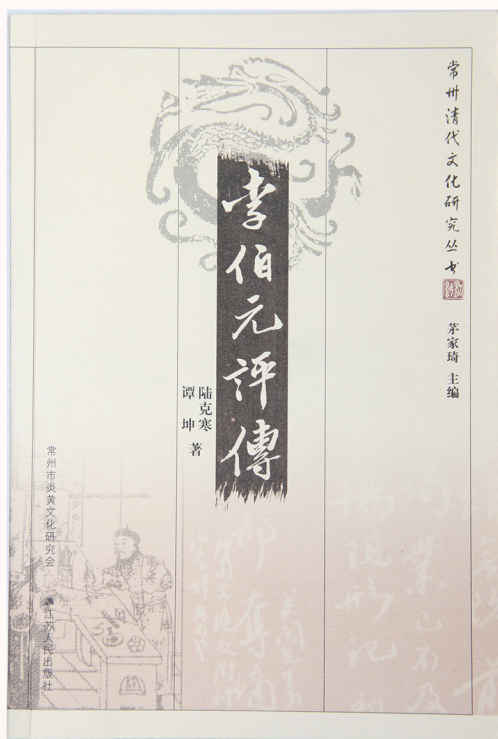
家一致表示，审批制度改革首先是国家确定统一标准，应按照国家来执行。其次，要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制定相关管理条例，并逐级监管强化执行力。再次，审批制度制定要有利于企业生产和创新发展，不能徒增负担，更不能不作为或乱作为，这样才不会形成乱象，企业的创新发展才有了希望。

宋正杰副局长希望企业强化依法治企，加快提升企业法治文化建设水平，充分发挥企业法治在服务改革、支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全面开创我市依法治企新局面作出新贡献。



协会秘书长邹云帆在交流中表示，将把企业的想法和建议通过有效途径反映给政府有关部门。希望各企业在新常态下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经济建设中的同时，继续不断强化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完善风险防范机制体系，提升常态化管理的质量。在新的一年里，乘势而上、再创佳绩，切实提升依法治企水平，促进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常州工学院 陆克寒教授



陆克寒,1964年12月生,江苏溧阳人。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校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校重点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带头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常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常州地方文化。出版学术专著《“文人”:启蒙与革命——瞿秋白的思想个案》(中央文献出版社)、《李伯元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等。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等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凡7项研究课题。荣获江苏省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获得江苏省第二届“长江杯”文学评论三等奖、江苏省首届“紫金文艺评论奖”三等奖。

